

陳寅恪論錢謙益「推崇曹能始 踰越分量」考辨

嚴志雄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論及曹能始的因由及引起的問題

清朝建立數年後，發生所謂「黃毓祺案」。順治四年(1647)，黃毓祺(1579-1648)起兵抗清，謀復常州，事敗潛逃。五年(1648)四月，黃被捕。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1582-1664)受黃案牽累，逮訊南京，至六年(1649)春始獲釋歸里¹。

陳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別傳》對此案之考辨特為詳盡，前後百餘頁，六萬餘言。《柳如是別傳》為研究牧齋、明清文史的典範、權威之作，有口皆碑，影響深遠。惜乎陳先生考論此案，誤判牧齋二獄案為一，論述有不少硬傷。事實

本文初稿曾於香港中文大學「錢謙益暨其師友門生詩文國際研討會」(二〇一八年五月)宣讀，嗣後多次修訂，並於日本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及上海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南京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所舉辦之學術會議或講座中報告相關內容。蒙師友不棄，給予筆者諸多修改意見，謹致謝忱。《集刊》所聘數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之論點、結構、論述詳略也提供了中肯的評議及修改意見，在此亦一併致謝。

¹ 此事梗概，可參《清史列傳·貳臣傳·錢謙益傳》所載：「以謙益曾留黃毓祺宿其家，且許助贊招兵，入奏，詔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至江寧訴辯：『前此供職內院，邀沐恩榮，圖報不遑，況年已七十，奄奄餘息，動履藉人扶掖，豈有他念？哀籲問官，乞開脫。』會首告謙益從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質，毓祺病死獄中，乃以謙益與毓祺素不相識，定讞。……於是得釋，歸。」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9，頁6577。

上，此數年間，牧齋曾二度陷獄：順治四年，因山東謝陞私藏兵器案牽連，逮獄北京；順治五、六年間，受黃毓祺起兵案牽連，頌繫南京²。陳先生之考證，百密一疏，混二事爲一，而牽一髮動全身，致使有很大一部分考釋文字不能成立，委實可惜。

陳先生考論牧齋於黃毓祺案期間所作詩文，所涉層面甚廣，頭緒紛如，其中讓人感到比較意外的，是牽連及牧齋對已故明季閩派詩人曹學佺（能始，1575-1646）³的評價⁴。陳氏於引述牧齋《列朝詩集》〈曹南宮學佺〉傳文後評道：「據此足見牧齋亦深知能始之詩文無甚可取。其請爲母作傳，并序初學集者，不過利用之以供政治之活動耳。」⁵

陳先生考述牧齋與黃毓祺案的種種，議及牧齋利用能始從事政治活動，背後其實有一更宏大的議論框架。陳先生的基本思路是這樣的：「關於牧齋所以得免死於黃毓祺案一事，今日頗難確攷。但必有人向當時清廷顯貴如洪承疇馬國柱或其他滿漢將帥等爲之解說，則無疑義。」⁶又：「但有一點可以斷定者，即牧齋之脫禍，由於人情，而不由於金錢。」⁷要之，「有人向當時清廷顯貴如洪承疇……爲之解說」、「脫禍，由於人情」云云，就是陳先生的出發點。陳氏相信，此際可幫助牧齋脫禍的就是清廷權要洪承疇（亨九，1593-1665）。洪氏乃清廷倚重的軍政大臣，時任江南總督，對犯罪嫌犯操有生殺之權，此殆無疑義，但業已謝世的閩籍詩人曹能始又與此事何干？陳氏是這樣發想的：「吾國舊日社會關係，大抵爲家族姻戚鄉里師弟及科舉之座主門生同年等。牧齋卒能脫免於黃案之牽累，自不能離此數端，而於科舉一端，即或表面無涉，實則間接亦有

² 可參何齡修：〈《柳如是別傳》讀後〉，《五庫齋清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118-123；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年），頁142-144、147-148，此二年之相關條文。李欣錫對此二獄案所涉及的時間及人物亦有頗詳細的考辨，見李欣錫：《錢謙益明亡以後詩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頁126-132。

³ 能始生年爲萬曆二年，一般西元標一五七四年，惟能始以其年閏十二月生，西元實已入一五七五年。

⁴ 陳氏考論錢、曹事，主要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章〈復明運動〉，頁944-954。

⁵ 同前註，頁948。

⁶ 同前註，頁895。

⁷ 同前註，頁899。

關也。」⁸ 能始進入陳氏考論牧齋頌繫金陵一案的視域，就是因為能始是福建名士，而洪承疇也是，二人曾是鄉里、好友。陳氏云：

牧齋熱中干進，自詡知兵。在明北都未傾覆以前，已甚關心福建一省，及至明南都傾覆以後，則潛作復明之活動，而閩海東南一隅，為鄭延平〔成功〕根據地，尤所注意，亦必然之勢也。夫牧齋當日所欲交結之閩人，本應為握有兵權之將領……。牧齋固負一時重望，而其勢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黨社範圍之外，更與閩海之武人隔閡。職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領袖，以作橋樑。苟明乎此，則牧齋所以特推重曹能始踰越分量，殊不足怪也。⁹

至於牧齋之詩文論與「政治活動」間的關係，陳氏也有一番頗發人深思的判斷：

綜觀牧齋平生論詩論文之著述，大別可分二類。第壹類為從文學觀點出發，如抨擊何李，稱譽松圓等。第貳類為從政治作用出發，如前論推崇曹能始踰越分量及選錄許有介詩，篇章繁多等。第壹類乃吾人今日所能理解，不煩贅述。第貳類則不得不稍詳言之，藉以說明今所得見牧齋黃案期間詩文中所涉及諸人之政治社會關係也。¹⁰

細繹上述諸語，可知陳先生考論能始與牧齋的關聯含二維度。能始首先是在牧齋頌繫金陵的語境中被論及的，故此際所謂之「政治社會關係」，應即指牧齋所欲調動以脫罪的資源，而江南總督洪承疇正其人也。陳氏認為，牧齋推崇能始詩文，僅在於藉此以討好有能力之閩籍人氏，使其為己疏通脫罪。於此語境，具體的時間點，若依陳氏之見，應落在順治四年五月至十月間。然而，在這個敘事邏輯中，陳氏又牽扯及牧齋請能始為亡母作傳、為《初學集》作序事（此乃發生在前明之事）¹¹，以及牧齋入清以後頌揚閩籍詩人之舉措。至此，陳氏能始與閩籍

⁸ 同前註，頁 944。陳先生於此開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法門，對明清文史研究大有啓迪之效。請參拙著：〈導論〉，《牧齋初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xx-xxv。

⁹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944。又：「關於曹能始之資料頗多，不須廣引，即觀明史及南疆逸史本傳，已足知能始為當日閩中士大夫之領袖。至其與鄭氏之關係及傾家助餉，欲成『奇兵浮海，直指金陵。』之舉，則皆南明興亡關鍵之所在，殊可注意也。」同上書，頁 945。

¹⁰ 同前註，頁 949-950。

¹¹ 此二事年份可考。崇禎九年（1636）春，牧齋有〈曹能始為先夫人立傳寄謝〉之作。能始為作傳，當成於崇禎九年春稍前。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二月一日前，能始為牧齋作〈錢受之先生集序〉（此序作期，尚須有文後署「中秋節」抑或「中和節」之辨，可以相

人氏政治社會關係之論其實已拓展至另一更大的語境——扶明及復明。要言之，陳氏認為，晚明時期，牧齋意欲通過能始以調動閩海的軍事力量以扶國家之將傾；明亡以後，牧齋從事地下復明工作，希望憑藉閩籍人脈資源以動用福建一帶鄭成功的軍隊，以圖恢復。

今欲證成或置疑陳氏此牧齋「推崇曹能始踰越分量」說，亟須考論二事：（一）能始對牧齋究竟有無政治利用價值？（二）牧齋是否欣賞能始之詩文？執此二端，本文上半，考述能始、牧齋二人在晚明官場及政壇上的經歷及能量，評估能始是否為牧齋可以利用之政治資本。本文亦將細考順治四年前後江南之政治形勢以及洪承疇之個人經歷，探論洪氏有否可能袒護、釋放牧齋。本文下半，論文事。筆者將論證，陳氏用以論述牧齋談論能始之材料頗有闕遺。陳氏僅據牧齋《列朝詩集小傳》能始小傳數語，即斷言牧齋不甚欣賞能始之詩文。本文考論的範圍則擴展至牧齋作於崇禎十三年(1640)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順治五、六年間(1648-1649)《列朝詩集小傳》之〈金陵社集諸詩人〉，以及若干關涉能始文事、舊事之文章片段，此皆牧齋直接述及能始於其時詩壇地位及形象之文獻。陳氏不援據徵之，其說難謂允洽。復次，筆者將指出，牧齋書寫能始最獨特之處，非在一般論者著眼的中晚明詩派發展史的脈絡中，而在萬曆以降更宏闊的人文環境、文化場域、文人交遊情況中。本文將探論牧齋如何在萬曆「海宇承平」之治世與金陵詩社之「極盛」的特殊語境中描畫能始。在牧齋筆下，帶來「金陵之極盛」的靈魂人物就是能始，吾人對牧齋賦予能始的意義實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二、曹能始對牧齋有無政治利用價值？

今欲辨陳寅恪先生之說是否屬實，有否可能，有必要知悉能始在晚明政壇上的地位及實力¹²。本節擬先對能始與牧齋之交誼作一具體考察，然後就能始的仕歷、於政治場域中的軌跡與位置¹³，考論二人於晚明政壇有無交集，以及能始對

差半年，且關係陳氏議論，詳下文）。

¹² 就晚明的政治生態而言，尤須瞭解其人在官場上的升沉進退、位秩高低，以及其與政黨集團（如所謂東林黨、齊楚浙黨、閩黨等）的關係，且政黨認同、黨性強弱、曾否介入黨爭及政治風波等，都應在考量範圍之內。

¹³ 曹能始事蹟，主要據陳慶元：〈曹學佺年表〉，《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牧齋有無政治利用價值可言。（下文考述二人交誼，乘便於相關年月，錄入能始與牧齋相互投贈之詩文，以期脈絡顯明，稽考、分析有據。）

牧齋與能始一生未曾面晤，只有書信往來。二人何時締交、緣何結識、友誼深淺等無由確考¹⁴。今見牧齋、能始酬贈之詩最早為崇禎五年(1632)能始之〈寄題奚川八景詩為錢受之作〉及崇禎九年(1636)牧齋之〈曹能始為先夫人立傳寄謝〉。

萬曆三十八年(1610)，牧齋以會試高第、殿試探花入仕，任翰林院編修，時年二十九歲。旋以父卒歸里守制，在家閒置十年，至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八月始還朝任原職。天啓元年(1621)，葉向高(1559-1627)再任首輔，東林黨人紛紛起用。秋，牧齋受命典試浙江。四年(1624)，閹黨編成《東林點將錄》，列牧齋第四十八位，擬作浪子燕青。六月，牧齋銷假還朝，接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編修，充經筵日講，歷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皇帝實錄。五年(1625)五月，因「黨人」名目，除名為民，南歸。

崇禎改元(1628)，春，召起牧齋，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年底，因「枚卜」爭入閣，陷入「閣訟」風波。溫體仁、周延儒以牧齋典試浙江失職舊事訐之，並指滿朝皆牧齋之黨。帝怒，命革職待罪。二年(1629)六月，牧齋出都南歸。

崇禎五年，牧齋五十一歲，自崇禎二年削籍歸，至本年已四載。秋間，偶得沈周為先祖所製《奚川八景圖》，乃作〈石田翁畫奚川八景圖歌〉、〈再題奚川八景畫卷〉¹⁵，又徵詩於四方大雅君子，云：「廣陵李沮修見之於金陵王氏，詢

2012年第5期，頁75-81；孫文秀：《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附錄〈曹學佺年譜〉，頁149-186；〔清〕曹孟喜：〈明殉節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雁澤先府君行述〉，見〔明〕曹學佺：《曹學佺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附錄，頁5-26。牧齋事蹟，主要據方良：《錢謙益年譜》。

¹⁴ 牧齋〈題錢叔寶手書續吳都文粹〉云：「辛酉冬，余北上往別……〔錢功甫〕忽問余：『曹能始尚在廣西，有便郵屬彼覓《通志》寄我。』」本文引用牧齋詩文，據〔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全集內所收《牧齋初學集》下文簡稱《初學集》；《牧齋有學集》簡稱《有學集》；《牧齋雜著》簡稱《雜著》。此處引文見《初學集》，卷84，頁1767。辛酉，天啓元年(1621)，時能始四十八歲，牧齋四十歲。細味此中數語，似牧齋與能始其時已經通信，有共同友人，且頗契合。

¹⁵ 牧齋〈再題奚川八景畫卷〉詩起云：「榮木樓頭風日美，秋光滿簷鶯聲喜。」可推知此二詩乃是年秋間之作。見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卷10，頁314。

知爲吾家故物，購以見詒。百三十年之後，頓還舊觀。焚香展卷，欣慨交集，遂作歌以記之。繼聲屬和，竊有望于君子焉。」¹⁶能始本年前後有〈寄題奚川詩爲錢受之〉，當係投贈之作。詩云：

予選明詩嘉靖中，匏菴唱和石田翁。論晴較雨當家話，食葉成文道者風。

吳地疎篁堪避俗，錢王荒草滿離宮。書聲一派深更裏，遶過奚川橋子東。¹⁷崇禎九年，牧齋五十五歲。春間，有〈曹能始爲先夫人立傳寄謝〉詩云：

逐子東征杳莫從，機殘績冷泣尸饔。青編幸遇曹能始，形管何慚范蔚宗。

築室不堪論舊隱，焚山寧復問新封？孤生滿掬三春淚，泉客珠成恰似儂。¹⁸今考牧齋生母顧氏太淑人於崇禎六年(1633)正月去世。七年(1634)正月，牧齋作〈先太淑人述〉。八年(1635)夏，適友人入閩，牧齋乃寓書能始，請爲亡母作傳¹⁹。傳成，牧齋遂有〈寄謝〉之作。

崇禎十年(1637)，禍起。三月下旬，因本邑張漢儒疏奏，牧齋被補，逮京究問。張揭帖訕牧齋及門人瞿式耜(1590-1650)居鄉惡狀五十六款。十一年(1638)五月，牧齋得赦。九月，南還。

十二年(1639)春，清軍大舉南下，攻山東。朝廷急調洪承疇北上抵禦清軍。能始同鄉摯友徐爌(興公，1570-1642)²⁰攜子陵(存永，?-1662)訪牧齋於拂水山莊，牧齋作〈晉安徐興公過訪山中有贈〉²¹。牧齋後於《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徐舉人燿·布衣爌〉憶及徐氏之訪並述及能始，云：

燿，字惟和；爌，字惟起，又字興公。……興公博學工文，善草隸書，萬

¹⁶ 同前註，頁312。

¹⁷ [明]曹學佺：《石倉四稿·西峰六二草》，收入《石倉全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本)，頁42b-43a。牧齋《列朝詩集》選錄本詩，改題〈寄題奚川八景詩爲錢受之作〉，見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丁集第14，頁5640。

¹⁸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卷10，頁346。

¹⁹ 能始爲作傳文，見曹學佺：《石倉四稿·西峰六二文》，收入《石倉全集》，卷3，頁1a-3b。牧齋〈張子石六十壽序〉有云：「子石遊閩，余寓書曹能始，請爲先太夫人傳。子石攝齋升堂，肅拜而後奉書。能始深歎之，以爲得古人弟子事師之禮。」見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有學集》，卷23，頁929。本文後署順治十年癸巳(1653)正月望日。牧齋致能始原函及張子石於崇禎七年夏遊閩謁能始事，可參看本文附錄筆者所輯得之牧齋二佚文。

²⁰ 徐爌生卒年據陳慶元：〈徐爌年表〉，《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頁57-66。

²¹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卷15，頁527-528。

曆間與曹能始狎主閩中詞盟，後進皆稱興公詩派。嗜古學，家多藏書，著《筆精》、《榕陰新檢》等書，以博洽稱於時。崇禎己卯，偕其子訪余山中，約以暇日，互搜所藏書，討求放失，復尤遂初、葉與中兩家書目之舊。能始聞之，欣然願與同事。遭時喪亂，興公、能始俱謝世，而余頽然一老，無志於斯文矣。興公之子延壽，能讀父書。林茂之云，劫灰之後，興公鰲峯藏書尚無恙也。²²

同年底，能始有〈寄錢受之〉云：

拂水丹房啓，懸崖白羽窺。知君行樂秘，轉自切憂時。
豈即携家隱，猶云拜賦遲。蒼蒼煙與霧，已抗俗塵姿。

聖世優閒典，初非前代論。不聞宮觀使，但可賜歸恩。
客有時驚座，公無日署門。語侵朝事際，趣令倒芳樽。²³

十三年(1640)正月，牧齋步其韻作〈得曹能始見懷詩次韻却寄二首〉：

院竹溪雲入，庭花野雀窺。憶君題扇日，已是歲殘時。
細雨篝燈早，輕寒命酒遲。即看堤上柳，春月想容姿。

年來淪放事，只合與君論。伏臘先人冢，樵漁聖主恩。
詩來期晚歲，吟罷倚柴門。歎息庭梅樹，天涯共一尊。²⁴

來日大難。崇禎十五年(1642)，明軍屢敗於李自成。二月，洪承疇降清。三月，清兵破錦州，下山東。時有郎官欲上書請牧齋開府東海，任搗剿之事。十六年(1643)，李自成軍與清軍已勢不可擋，大明江山岌岌可危。三月，牧齋作〈請調

²²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丁集下〈徐舉人燠·布衣燠〉，頁633-634。本書下文簡稱《小傳》。「萬曆間與曹能始狎主閩中詞盟」一句，此本作「萬曆間與曹能始狎，主閩中詞盟」，標點誤，影響文意，今正之。「狎主」成詞，交替主持之意，如《左傳·昭公元年》：「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杜預注：「強弱無常，故更主盟。」（〔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41，頁700b）「狎主詞壇」云云，牧齋著述中屢見，下文引述之〈稼菴近草序〉中即有另一用例，可參。

²³ 曹學佺：《石倉五稿·西峰用六篇》，收入《石倉全集》，頁48b-49a。牧齋《列朝詩集》選錄本詩，改題〈寄錢受之二首（己卯）〉，見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第14，頁5636-5637。

²⁴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卷16，頁560-561。《初學集》中，此卷屬「丙舍詩集（下）」（「起十三年庚辰正月，盡二月」）。

用閩帥議》，建議借閩海鄭芝龍(1604-1661)兵，遠復荊襄，近捍京師。為復出參政積極活動。冬，《初學集》成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牧齋六十三歲。二月一日前，能始為作〈錢受之先生集序〉，文末云：

予與海虞先生之聞世，亦屢更矣。當其可樂，有有憂者存焉；當其可憂，則已亦難于獨樂矣。樂行憂違，君子未嘗以隱居為樂也，確乎其不可拔。予與先生，當共勉之。庶天下後世知吾受之之詩與文，如嚴君平不作苟見而已。若謂動之必固靜之，若謂曉之必固愚之，則又非。予與受之，非有意于持世者也。惟無心于世者，而世數又烏足以局之者哉？時崇禎甲申中和節，友弟曹學佺能始識。²⁵

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引能始本序末二句作「時崇禎甲申中秋節，友弟曹學佺能始識」。陳氏云：「牧齋刻集既成之後，幾歷一年之久，復請能始補作一序。其推重曹氏如此，可為例證。」²⁶ 牧齋推重能始，請序一事，固為顯證，惟「補作」云云，說誤。《初學集》錢仲聯先生整理本能始本序後題「時崇禎甲申中和節」，復檢明崇禎瞿式耜刻本（民國涵芬樓影印）、宣統遼漢齋《牧齋全集》本、近刊《牧齋初學集詩注彙校》本，俱作「中和節」（「和」字，舊本作「穌」，錢仲聯本改排通行體）。陳氏誤「和」為「秋」。中和節，在農曆二月初一；中秋節，八月十五，相距半年有奇。程嘉燧（孟陽，1565-1644）〈牧齋先生初學集序〉云：「歲癸未冬，海虞瞿稼軒刻其師牧齋先生《初學集》一百卷既成。」²⁷ 據此，一般著錄，亦以是書刊於崇禎十六年冬。至翌年中秋，約略一年，陳氏遂有上論。今考《初學集》編成於癸未冬，此無疑，程序亦作於是時，惟該書於冬未至翌年春仍在陸續刻板印刷，尚有補充，集中最後一題詩為〈甲申元日〉、全集共一百一十卷（非百卷，不過程氏舉其成數言之也有可能），可證。復次，甲申三月北都國變，五月南明弘光朝立；六月，起升牧齋為禮部尚書。本年八月以前，可謂天崩地坼之時。國事蝸蟻，如沸如羹，錢、曹二公還有閒情為詩文集請序撰序？且細味能始序文，無一語及甲申年此等大事，不合情理。綜上種種，可合理判斷，其序實寫於甲申中和節前後，正值《初學集》後期製作，並非於其書刻行後一年始應牧齋之請而補寫。

²⁵ 同前註，附錄，頁 2226。

²⁶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946。

²⁷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附錄，頁 2224。

話說回來，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自縊殉國。能始聞變，痛哭不食，投水，家人亟救而甦。五月十五日，明福王由崧即位南京，是為弘光帝。六月，起升牧齋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六月末，廷議調鄭師入衛，年底由鄭鴻逵率兵駐鎮江，鄭成功隨從，入南京國子學，並拜牧齋為師。

順治二年(1645)五月十日，弘光帝夜奔太平。十五日，南京城內文武大臣迎降。牧齋引清官、兵入城，並導之搜宮。或云牧齋且為清傳檄四方，諭令降順。閏六月，清廷命內院大學士洪承疇以原官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地方。同月，明唐王聿鍵即帝位於福建福州，改元隆武。七月，牧齋奉命隨多鐸進京。

隆武朝立，能始被召，起授為太常卿。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進尚書，加太子太保。奉命草創隆武朝典禮，兼修《崇禎實錄》。順治三年(1646)四月，「上〔隆武〕在延津。……朝議欲以兵浮海，直指金陵，而艱于聚餉，學佺傾家以萬金濟之」²⁸。八月，清兵入閩，隆武在汀州被俘，死於福州。九月十七日，清兵陷福州城。十八日，能始沐浴整衣冠，自縊死，享年七十又三。

順治三年元月，清廷任牧齋為禮部右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牧齋稱疾乞歸，七月放行。

順治四年，清廷逮捕多名降清「貳臣」。三月，牧齋晨興禮佛，忽被急徵。清廷查明牧齋與山東謝陸私藏兵器案無關後放歸。十一月，洪承疇因函可(1612-1660)案被「議處」（詳下節）。

順治五年五月，牧齋因黃毓祺謀反案牽引，至南京訴辯，頌繫。牧齋〈新安方氏伯仲詩序〉云：「戊子歲，余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偃行相慰問。……相與循故宮，踏落葉，悲歌相和，既而相泣，忘其身為楚囚也。」²⁹林古度（茂之，1580-1665），閩人，為能始及牧齋摯友。秋梢，牧齋作〈題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云：

余與能始宦途不相值，晚年郵筒促數，相與託末契焉。然予竟未識能始為何如人也。今年來白下，重逢茂之，劇談能始生平，想見其眉目嘖笑，顯顯然如在吾目中，竊自幸始識能始也。頃復見能始所製壽序，則不獨茂之之生平歷歷可指，而兩人之眉目嘖笑，又皆宛然在尺幅中。天下有真朋

²⁸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卷17〈曹學佺傳〉，頁115。

²⁹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有學集》，卷20，頁843。

友，有真性情，乃有真文字。世人安得而知之。余往刻《初學集》，能始爲作序。能始不多見予詩文，而想像爲之，雖繆相推與，其辭藐藐云爾。讀此文，益自恨交能始之晚也。雖然，能始爲全人以去，三年之後，其藏血已化碧。而予也楚囚越吟，連蹇不即死。予之眉目嘖笑，臨流攬鏡，往往自憎自嘆，輒欲引而去之。而猶悵快能始知予之淺也，不亦愚而可笑哉！戊子秋盡，虞山錢謙益撰于秦淮頌繫之所。³⁰

上文不嫌瑣碎，敘述了能始與牧齋之交誼並酬贈詩文，以下據之作一歸納分析。

在牧齋頌繫金陵的脈絡中，具體而關鍵的時間點，若依陳寅恪先生之說，應落在順治四年五至十月間³¹。陳先生認爲：

此時清廷委任江寧之最高長官乃洪亨九。……巴山等舉發函可案，在順治四年丁亥十月。牧齋於四年四月被逮至南京入獄，歷四十日出獄。其出獄之時間，當在五月。然則牧齋殆可經由顧〔夢游〕韓〔函可〕之關係，向洪氏解脫其反清之罪。³²

若依其說，此際所謂之閩籍「政治社會關係」，結穴在牧齋可憑藉以脫罪的資源與力量。要言之，牧齋牽涉黃毓祺謀反案，事態嚴重，性命堪虞，必須依靠清廷所倚重、信賴之權貴爲己辯護開脫，而江南總督洪承疇正其人也。洪承疇，福建南安人，能始同鄉友。陳氏認爲牧齋之推崇能始，非出於對其詩文之好賞，而在於藉此以討好有能力之閩籍人氏，能始只是可供利用的政治資本而已。然而，陳氏又牽扯及前明時牧齋與能始之互動，以及入清後牧齋稱揚閩籍詩人之舉措。如此，如上文所述，陳氏之論實已擴展至另一更大語境——扶明與復明。

下文試評估能始於明清之際是否可以成爲牧齋的政治活動資本。

今考能始一生居官與鄉居可分六階段：萬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597-1598)於北京任戶部主事（正六品）；萬曆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1599-1607)任官南京，最高職位爲戶部郎中（正五品）；萬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08-1612)任官四川，最高職位爲按察使（正三品）；萬曆四十一年至天啓二年(1613-1622)，鄉居；天啓三年至六年(1623-1626)，任官廣西，最高職位爲右參議（從四品）；天啓七年(1627)起，鄉居，從此不再復出。居鄉期間，崇禎二年(1629)

³⁰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雜著·牧齋外集》，卷25，頁843-844。

³¹ 上文已述及，其實陳先生對於這個時間點的判斷是錯誤的。牧齋頌繫南京，年月應爲順治五年四月以後至順治六年春。對此，先置之不論。

³²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938，另可參頁953-954。

曾有廣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之任命，不赴。

整體而言，能始在四川任上官運較佳，初任右參政（從三品），三年後升按察使（正三品），此乃能始於前明所獲之最高品秩。不幸的是，能始任按察使一年後即「被讒獲謗」，削三級放歸。隨後鄉居十年，始再起廣西右參議，卻只是從四品的官。能始任職廣西期間，於天啓六年獲升陝西副使（正四品），未赴。約在此時，朝中有疏奏能始賢能者，鄉人內閣首輔葉向高亦欲薦其入朝。如此事成，能始品秩可能較高，且居京官，對政治較有影響力。但不旋踵而朝中閹黨疏劾能始曾著書述萬曆朝之梃擊案，指其「淆亂國章」。後果嚴重，部議削職爲民。最後免於削籍，罷官，嚴譴放歸。天啓七年歸閩後，能始即未再復出。至崇禎二年，有廣西副使之命，仍是外官，且與罷官前一樣，只是正四品，能始不赴。

縱觀能始仕宦生涯，授官後旋即因事左遷。南京之官，閒曹冷局十載。之後任官四川、廣西，都是外官，品秩不算高，期間只有一次被薦入朝的機會，事不果。能始四川、廣西之任，更是以獲謗罷官告終。此外，除了被閹黨奏劾一事，能始從未與萬曆以降的重要政治事件發生關係，也似無政壇影響力。復次，在天啓六年罷官以前，能始與牧齋在仕途、政壇上，並無任何直接交會。

迨崇禎五年，能始寄贈牧齋〈寄題奚川八景詩爲錢受之作〉，時已罷官六年；九年前後，能始爲牧齋亡母作傳，時已鄉居十年。期間，能始似無明顯的政治活動；唯一一次再起之命，是在能始爲牧齋母作傳前八年的崇禎二年，能始不赴。能始爲牧齋母作傳前，有一人與能始、牧齋都有淵源，且位居要津，德高望重——那就是葉向高。葉向高對能始與牧齋都賞識有加。如果說牧齋請能始爲母作傳是利用他從事政治活動的話，也許可以猜測，牧齋欲通過與能始的關係向葉向高靠攏，以圖東山再起。可是，葉向高已於天啓四年致仕，後三年病逝，不可能影響崇禎一朝的政治或人事了。

綜上種種，在晚明時期，能始有何政治價值可供牧齋利用，實在令人懷疑。甲申年春，能始序牧齋《初學集》，年已七十有一，罷官居鄉且十八載，其撰序前後，似亦無實質的政治利用價值可言。（此前一年，誤傳洪承疇殉明，能始有詩悼之，並議建祠。此與其時國家重大事件以及舉鄉賢有關，性質上並非政治行爲。）陳寅恪先生曾引述牧齋〈題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此文後署「戊子[1648]秋盡，虞山錢謙益撰于秦淮頌繫之所」，可確知寫於頌繫南京期間。此時如牧齋所說：「能始爲全人以去，三年之後，其藏血已化碧。」若然此際尚有可

供利用的政治價值，那只能是相當間接的了。

復次，陳先生認為，牧齋熱衷干進，自詡知兵，因而前明時已關注閩海之軍事力量，至入清後又潛作復明活動，更須指望福建一帶鄭成功的軍力，但其與閩海武將並無淵源，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領袖，以作橋樑」。能始「福建士大夫之領袖」此一身分無疑是可以肯定的；牧齋於明清之際一直關注閩地的軍事力量也是事實，故而牧齋藉著揚詡能始以攏絡閩地將領也不無可能。不過，說到底，牧齋利用能始從事政治活動此一說法始終只是一個富有啓發性的猜想，陳先生並未提出任何實質證據以資佐證。《柳如是別傳》於上世紀一九八〇年出版，迄今已近四十年，我們也沒有找到可以為陳先生證成此說的相關文獻。無從驗證，也就難以進一步展開討論。對此，我們只能「姑存一說」。但同時，我們卻必須思考，陳先生持此假設以解釋牧齋所有書寫能始（甚或其他閩籍詩人，如許有介）的行為及動機，是否存在「主題先行」或「以假設為結論」的問題？設若我們不加反思地接受陳先生的說法，閱讀相關的詩文時，視野是否會有所遮蔽？如是，我們將喪失甚麼？固然，我們不必放棄政治託喻式解讀 (political allegoresis)，也不必視陳先生之論為非，因為文本每每蘊含多重意義，有不同的「賦義」(processes of signification) 可能³³。但是，就牧齋與能始此一關聯而言，實在有必要在政治託喻的相同位置上釋放出一個人文的、文化的、文學的世界來。這個世界本來是文本及其產生機制所直接導向的，只是在《柳如是別傳》的詮釋範式中，一直被壓抑著、漠視著，茲嘗試論之。

統觀上文述引牧齋、能始書寫對方之詩文，大率屬明季文人間習見之文藝、應酬、情感互動，似無特別、敏感的政治意味在。崇禎五年，牧齋偶得沈周為家先祖所製畫圖，感動不已，特作二長詩以紀其事並書懷，又徵詩於四方友好，索求和作，能始乃為寫〈寄題奚川八景詩為錢受之作〉。同時應和之作，今所傳者，尚有程嘉燧〈和牧齋題沈石田奚川八景圖歌〉³⁴、周永年（安期，1582-

³³ 關於陳先生著作中所展現的文學批評觀及其與歷史詮釋的關係，可參李貴生：〈文學鑑賞與歷史詮釋：陳寅恪批評觀念探析〉，《國文學報》第62期（2017年12月），頁237-282；又〈陳寅恪典故考釋批評觀念及其實踐方法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9年6月），頁341-388。

³⁴ [明]程嘉燧撰，上海市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編，沈習康點校：《耦耕堂集·耦耕堂集詩》，卷上，收入《程嘉燧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422-423。

1647)〈次韻和牧翁題沈啓南奚川八景圖卷〉³⁵。

崇禎九年，牧齋有〈曹能始爲先夫人立傳寄謝〉，可藉知牧齋曾求能始爲亡母撰傳。此事其實最能反映牧齋對能始敬重有加。爲先父母立傳，於人子言，固極慎重之事，苟且不得。一般而言，明清文人如非親自操觚，則請託於當世名宦（包括已致仕者）或名家之流，而其人多與請求者有世交之誼。顧其時能始已罷官居鄉十載，錢、曹亦無世誼，二人甚至不曾識面，可知牧齋乃以能始爲當代文章鉅公而乞求之³⁶。牧齋詩云：「青編幸遇曹能始，彤管何慚范蔚宗」，謝能始之意至厚。

崇禎十二年歲末，能始有〈寄錢受之二首〉。十三年開春，牧齋因寫〈得曹能始見懷詩次韻却寄二首〉。一唱一和，牧齋詩且係步能始韻者。此乃現傳二家酬贈之作中僅見的情感與思想的直接交流。詳味四詩內容，知能始作詩寓牧齋，乃慰其於崇禎十年至十一年間因被誣告逮京究問，下刑部獄之遭遇，以及年來奉旨革職閒住之不堪事。能始詩有句云：「聖代優閒典，初非前代論。不聞宮觀使，但可賜歸恩。」牧齋詩有云：「年來淪放事，只合與君論。伏臘先人冢，樵漁聖主恩。」二家之詩無疑涉及崇禎朝政治、時局、文人遭際（其時類似之詩極多）。然而，能始雖語及「聖世」、「朝事」，其用意，始終在慰牧齋離憂之情，非在月旦政治。牧齋次韻之作，答酬能始眷愛，字裏行間，是帶有幾分政治牢騷，但甚含蓄。

牧齋之「丁丑獄案」轟動一時，牧齋謂「自頌繫以來，四方人士，間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之人」³⁷。聲援牧齋之詩文甚夥，如吳偉業(1609-1671)爲瞿式耜及牧齋作有長篇〈東皋草堂歌〉，陳子龍(1608-1647)和之，亦有同題之作。又如牧齋有〈荅上吳子德輿次東坡獄中寄子由韻作丁丑紀聞詩六首蓋悲余之逮繫

³⁵ 周永年詩共二首，第二首題〈又和題〉，俱見錢謙益撰集：《列朝詩集》，丁集第13之下，頁5528-5529。《御定歷代題畫詩類》載此二詩，題明沈璜作，不確。見〔清〕陳邦彥編：《御定歷代題畫詩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5-1436冊），卷29，頁18a-20b。

³⁶ 陳廣宏研究「閩詩傳統」有年，亦曾指出：「如錢謙益對曹氏的敬佩——他乞學侄爲母作傳，並序《初學集》，應該可以說明曹氏的實力與地位。」見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393。

³⁷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贈侯朝宗敘〉，《初學集》，卷35，頁1002。

而喜其獄之漸解也感而和之亦如其前後之次》³⁸、〈送曲周路侍御之官中州路曾抗疏爲余伸雪牽連謫官〉³⁹、〈次韻答項水心宮諭見贈〉等詩⁴⁰，藉之頗可窺見其時詩文湧動的情況。能始詩則牧齋獄事塵埃落定後作以存問者，其何故後至，無從考論矣。

崇禎十七年，牧齋刻《初學集》，能始爲作〈錢受之先生集序〉。《初學集》以三序弁首，一序囑摯友程嘉燧，一序請於能始，一序乃牧齋另一老友蕭士瑋(1585-1651)所爲製者。於二密友外，牧齋獨求序於能始，足見其對能始之重視。能始此序，及於牧齋之文事者，卻僅一句：「庶天下後世知吾受之之詩與文，如嚴君平之不作苟見而已。」能始文之主腦，實在士君子「處今之世」之憂樂之道。能始於「民溺民飢之憂」、「簞瓢陋巷之樂」二義上做文章，頌牧齋閱世屢更，乃真能「持世」者⁴¹。能始感慨於世道人心，其文寫來曲折迂迴，不無可觀之處，夷究其實，卻又難說是專爲牧齋而作者，蓋其於牧齋之學行與詩文幾無著墨，移之置當世任一大人先生之集首，亦無不可（學者研究牧齋，鮮少引用此文，亦以此故）。能始於文首即直言「予與海虞先生，未之親暱也，覲面之何曾，而矢志之不二，其所親更有甚于此者」⁴²，能始雖與牧齋志同道合，但未嘗過從晤面，此文如何經營，想能始亦費煞思量。無論如何，牧齋求序於能始，能始允其請，仍可見二人君子之交，惺惺相惜。

迨清順治五年，牧齋頌繫金陵，與林茂之輩昕夕盤桓，因見能始爲茂之所製壽序，喜其活潑傳神，乃有〈題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之作，於茲抒發「天下有眞朋友，有眞性情，乃有眞文字」之慨。牧齋於文首云：「余與能始宦途不相值，晚年郵筒促數，相與託未契焉。然予竟未識能始爲何如人也。」後文又云：「余往刻《初學集》，能始爲作序。能始不多見予詩文，而想像爲之，雖繆相推與，其辭藐藐云爾。」牧齋自恨交能始晚，未及親近，見其「眉目嚙笑」，知悉其生平行事，也以「能始知予之淺」爲憾。此中數語，其實最足表徵牧齋與能始於前明之友誼情況：二人乃名士之交，淡而有節，雋永有味，但於生活上並無交會，思想與情感的交流也維持在特定的範圍內，不逾矩（也可以說，非性命之

³⁸ 同前註，卷13，頁462-464。

³⁹ 同前註，頁478。

⁴⁰ 同前註，頁486-487。

⁴¹ 同前註，附錄，頁2226。

⁴² 同前註。

交、患難之交之屬)。牧齋於文末言及「能始爲全人以去，三年之後，其藏血已化碧」，而已則「楚囚越吟，連蹇不即死」，感慨系之矣。牧齋贊美能始，復自傷自嘲，但本文重心在朋友之道及心靈求索，非在政治遭遇，似不宜求之過深。

總而言之，上述詩文顯露的主要是牧齋與能始在文事以及友誼上的交流互動，於晚明文士可謂尋常之至，司空見慣。若言「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⁴³，文本背後尚有政治動機與作用存在，則有必要提出與之相關的證據，相互鋪陳驗證，方爲發覆、信實之論。假如詩文內無此消息，詩文之外又無其他史文可資稽考互證，其近於臆說矣。

三、順治四年前後，江南總督洪承疇有無可能袒護、釋放牧齋？

這是一個僞命題，因爲根本不存在這個可能。學者已經考明，牧齋乃於順治五年逮繫南京，非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在順治四年。順治五年，任江南總督的是馬國柱(?-1664)，非洪承疇，洪氏於牧齋抵達南京前已命駕北返。但是，這又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命題。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史家陳寅恪先生是怎樣展開論證、怎樣編織這個故事的呢？再者，在筆者的閱讀印象中，順治四年對江南文士來說是相當殘酷的一年。清人興大獄，株連甚廣，如我們熟知的「明詩殿軍」陳子龍就是在當年夏天遇難的。在這樣的政治氣壓下，假如牧齋真的在該年因受謀反案牽連逮繫金陵，欽命招撫江南的洪總督，能否包庇、釋放他？下文擬對這些疑惑與問題作一番考索。

陳寅恪先生認爲，順治四年，江南最高之軍政長官爲洪承疇，而清江寧將軍巴山(?-1673)向清廷舉發函可案，事在其年十月，之後洪承疇被捲入漩渦；牧齋則在四月被逮至南京，入獄四十日後釋放，開始軟禁，時間當在五月，因而本年五至十月間，牧齋可經由函可等之關係拉攏洪承疇，使渠爲己掩護，洗脫罪名。

以下，考察洪承疇在江南的經歷。先是順治二年閏六月十三日，清廷命內院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疇以原官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當時，清朝肇始，地方未靖（尤其是剃髮令頒下後），南明諸王抗清勢力漸成氣候。洪氏官拜江南招撫之際，明唐王朱聿鍵即位福州，改元隆武；

⁴³ 杜預：〈春秋序〉，杜預注，孔穎達疏：《左傳注疏附校勘記》，頁13b。

魯王朱以海近在紹興，以監國名義下恢復令。清廷命洪承疇招撫江南，是委以重任。八月，洪抵江南，開府江寧。四年七月，清廷升任馬國柱為江南總督，代替洪承疇。洪、馬交接後，洪於順治五年二、三月間起程返京。洪氏總督江南，前後約合三年。在任期間，受洪直接指揮的是由明降清軍隊改編而成的江南綠營，麾下幹將有池太營總兵卜從善、徽州營總兵胡茂楨、松江府提督總兵吳勝兆(?-1647)、張天祿(?-1659)等⁴⁴。

總督江南期間，洪承疇捲入二起復明案件，一為其直系將領吳勝兆的「反正」案，一為與其有世誼的函可和尚的「文字獄」案。此二事，一武一文，都發生在順治四年，正值陳先生認為牧齋頌繫金陵期間。事件發生在洪承疇治下，洪氏要親自審理，並及時向朝廷稟報。

吳勝兆案猝生於四月十六日前後，乃前明降清將領首起「反正」案，事態敏感。微妙的是，在吳案爆發前，洪承疇有請求離任的舉動。洪於三月二十五日上疏，哀訴驚聞父喪，請求「准臣守制，以全子道事」⁴⁵。這是可以理解同情的。四月十日，洪再以守制及目疾為由呈揭，謂因父喪「目病增劇」，「右目全然不明……左目已有五六分之病」（洪之目疾，有說即今所謂之白內障）⁴⁶，乞求皇上聖恩、皇叔父攝政王睿慈，准予回京⁴⁷。洪言之懇切，入情入理，但有論者猜測，此一四月告病本其實與該月發生的、事涉洪氏的一樁南明反間案有關。事緣四月四日清軍截獲兩封秘密文件，事關洪總督、江寧巡撫土國寶(?-1651)與南明政權。五月，帝有專諭下發洪、土，藉之可知事情之梗概：

〔五月初九日己酉〕又諭洪承疇、土國寶曰：「順治四年四月初四日，柘林遊擊陳可搜獲敕一道，內云：『封承疇為國公、國寶為侯爵。』又黃斌卿密書內云：『承疇所具本章，已為轉奏；國寶二次密字，亦已轉奏國主

⁴⁴ 此處及下文所述洪承疇事蹟，主要參考王宏志：《洪承疇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李新達：《洪承疇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⁴⁵ 〔清〕洪承疇：〈微臣驚聞父喪謹陳下情准臣守制以全子道事揭帖〉（順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收入孔昭明編：《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第4輯，頁7-8。

⁴⁶ 王宏志說，見王宏志：《洪承疇傳》，頁258-259。

⁴⁷ 洪承疇：〈江南總督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揭帖〉（順治四年四月初十日），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年），甲編第二本，頁181。

訖。』又云：『內仗承疇殺巴、張二將，外託國寶靖除地方，則江南不足定』等語。」⁴⁸

被誣陷與南明抗清力量勾結，非同小可。洪承疇四月十日上呈請求回京帖，不無試探清廷對他的態度的可能⁴⁹。此事複雜，文獻不足，難以進一步展開討論。但我們至少要知道，在陳先生認為牧齋到達南京前後，洪承疇正身處一場誣陷風波，事涉其人棄清返明的可能。

同月，在清廷還未回覆洪的請求以前，爆發了令洪更難堪，事態更嚴重的松江府提督總兵吳勝兆謀叛案：

〔四月二十日辛卯〕江寧巡撫土國寶疏報：「蘇松提督吳勝兆謀叛，殺死方姓推官、楊姓同知。督標將官高永義等立縛勝兆并同謀之陸同，獲偽銀印一顆，隨解江寧內院臣洪承疇研審確情，請旨發落！其叛黨馬雄、顧友成脫逃。」疏入，命察永義等功次，并二廳官被殺情由，脫逃叛黨嚴緝務獲。⁵⁰

四月十六日，吳勝兆殺刑推官方重朗、海防同知楊之易，隨令各官割辮，宣布反正。十七日，中軍副將詹世勛率部殺入，吳被執，事敗。事發後數日，土國寶奏報清廷。六月，吳就戮江寧。

牧齋應該慶幸是在順治五年逮繫南京，非如陳先生所說的在順治四年。要是牧齋在順治四年四月被捕至南京，情況大不妙，他會碰上吳勝兆反案。洪承疇殺吳勝兆，並奉嚴旨，窮究其事。巡撫土國寶乘此欲盡除三吳名士，株連甚廣。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五月九日載：

初，故明廢紳侯峒曾等遣姦細潛通偽魯王，為柘林遊擊陳可所獲，中有偽敕一道，反間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及巡撫土國寶。事聞，覺其詐，於是諭江寧等處昂邦章京巴山、張大猷曰：「爾等鎮守地方，遇有亂萌及姦細往來，嚴察獲解，具見爾等公忠盡職。大學士洪承疇、巡撫土國寶，皆因效力我朝，故賊用間諜誣陷。總兵吳勝兆監收姦細謝堯文，供稱嘉定縣廢紳侯峒曾子侯懸澗等具逆疏付堯文潛通魯王。爾等即將姦細謝堯文、窩逆之孫梢及有名各犯拘提到官，公同大學士洪承疇、操江巡撫陳錦嚴行審究具

⁴⁸ 《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清實錄》第3冊），卷32，頁3a-b（總頁263）。本書下簡稱《實錄》。

⁴⁹ 參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頁225。

⁵⁰ 《實錄》，卷31，頁13a-b（總頁260）。

奏。」又諭洪承疇、土國寶曰：「順治四年四月初四日，柘林遊擊陳可搜獲敕一道，內云：『封承疇爲國公、國寶爲侯爵。』又黃斌卿密書內云：『承疇所具本章，已爲轉奏；國寶二次密字，亦已轉奏國主訖。』又云：『內仗承疇殺巴、張二將，外託國寶靖除地方，則江南不足定』等語。朕見此，益知賊計真同兒戲。因卿等皆我朝效力大臣，故反間以圖陰陷，朕豈墮此小人之計耶！卿等當益勵忠勤，以報國恩，勿以此介意！」⁵¹

上述事關洪承疇的南明反間陰謀，清廷於此明確表態，不予相信，並撫慰洪氏。陳先生認爲，牧齋於五月出獄，而函可案發生於十月，故而五月至十月間，洪承疇應可掩護牧齋，使之脫罪。然而，事實上，從四月到九月底，洪承疇一直都很繃緊、很忙，大概顧不上牧齋。

因爲吳勝兆謀反，清廷下令巴山、張大猷協同洪承疇、土國寶，徹查江南士紳之「潛通魯王」事。以是，吳氏反案遂與「通海案」一併嚴緝、窮究。四月底，蘇州名士楊廷樞爲巴山手刃。五月九日，侯岐曾、錢梅、徐爾毅同時被捕。五月十三日，陳子龍於顧天達宅被逮，押解途中乘隙投水死。顧天達、天遴、侯岐曾以曾匿藏陳子龍，同日見殺於松江。稍後，顧咸正被捕。五月二十五日，夏之旭自殺。六月中，劉曙、管定武被捕。七月十五日，夏完淳被捕。四月至九月間，追捕、處決相尋不絕，風聲鶴唳，人心惶惶⁵²。

《實錄》五月十九日載：

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疏報：「故明推官陳子龍陰受僞魯王部院職銜，結聯太湖巨寇，潛通舟山餘孽。章京索卜圖計擒之，子龍投水死，湖海諸寇聞風解散，蘇松一帶漸次削平。」⁵³

此疏以外，洪承疇尚有四、五件題本、揭帖向清廷報告「叛犯正法」日期。據之，七月三日，十一人在南京「梟斬」；九月十九日，又四十餘人「梟斬」，妻子、家產「籍沒起解」⁵⁴。

我們要注意，牧齋是因爲黃毓祺謀反案而被逮繫金陵的，其案性質與吳勝兆

⁵¹ 同前註，卷 32，頁 2b-3b（總頁 262-263）。陳寅恪先生述此事，據《清史列朝·貳臣傳·洪承疇傳》，以之討論本年秋冬間之函可案，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941-942。

⁵² 參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頁 198-208。

⁵³ 《實錄》，卷 32，頁 5b（總頁 264）。

⁵⁴ 參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頁 207-208。

案及通海案類似（都事涉謀反）。再則在通海案中遇害的，有若干牧齋的故人，如楊廷樞、陳子龍、侯岐曾、夏完淳等——他們的死期，正陳先生想像牧齋出獄之時。

《實錄》六月二十一日載：「遣官賜大學士洪承疇東珠、孔雀翎、涼帽、四團補蟒袍、蟒襪、黃勒韉、酥油乳酒。」⁵⁵ 這賞賜是特殊恩典，似乎清廷對洪承疇放心了。孰料約一個月後，朝廷突然宣布，江南總督之大位，由馬國柱接掌：「〔七月十九日戊午〕陞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馬國柱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河南等處。」⁵⁶ 《清史列傳·洪承疇傳》敘述此事，許是怕有「此地無銀」之嫌，提供了一個尚算周全的說法：「承疇以江南湖海諸寇俱削平。又聞其父已卒於閩，請解任守制，乃調宣大總督馬國柱為江南江西河南總督，命承疇俟假滿，仍回內院任事。五年四月，至京。」⁵⁷ 然而，後之學者認為，事態並不尋常，朝廷如此安排，洪承疇形同被解職⁵⁸。無論朝廷此舉，是出於對洪承疇的眷顧（招撫江南初期剿平南明抗清力量相當賣力、目疾、父喪），或是猜疑（南明千方百計要策反他、屬下部將反清、其治下江南士紳潛通明魯王），洪承疇此際要面對的是政治權力、職位的釋出與移交。既成「代理」，諸事穩妥，不招惹是非，方為上策。馬國柱未即時到任，事務交接亦需時日，洪承疇到了順治五年二月初才離開江南返京⁵⁹。

在江南的最後數月，卻又冒出兩件讓洪總督煩惱的事來。《實錄》十月十一日載：「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以江南織解誥軸違式〔案：江南織造也屬洪氏管

⁵⁵ 《實錄》，卷 32，頁 14b（總頁 268）。

⁵⁶ 同前註，卷 33，頁 5a-b（總頁 272）。

⁵⁷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 78〈貳臣傳·洪承疇傳〉，頁 6448。

⁵⁸ 參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頁 225。另參李新達：《洪承疇傳》，頁 183。Frederic Wakeman 述洪承疇及函可此案，小節標題為“Qing Suspicions”（清人的猜疑），亦彰顯了清廷此際對洪氏之忠誠不無懷疑，參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758-764。王成勉論述此等事件則不強調清人對洪承疇的猜疑，但亦指出，洪乃深諳政治之道、知進退之人，本年洪上疏自求解職乃出於對時局及己之處境的考量。參 Chen-main Wang, *The Life and Career of Hung Ch'eng-ch'ou (1593-1665): Public Service in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 (Ann Arbor, Michigan: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1999), pp. 165-169。

⁵⁹ 參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頁 225。或謂交接完成，已是順治五年三月。參王宏志：《洪承疇傳》，頁 260、264。

轄〕，上疏自劾。部議削宮保部院職銜，命免之。」⁶⁰ 誥軸是皇帝書寫詔令的卷軸。江南織造不知怎的竟然織出前明的樣式來，當然不能用，浪費了三千六百兩銀子。清廷大方，不追究。約在同時，發生了更棘手的函可案：

〔十一月十五日辛亥〕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犯僧函可，係故明禮部尚書韓日纘之子，日纘乃臣會試房師。函可出家多年。於順治二年正月內，函可自廣東來江寧刷印藏經。值大兵平定江南，粵東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從不一見。今以廣東路通回里，向臣請牌。臣給印牌，約束甚嚴。因出城門盤驗，經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鍼書稿，字失避忌，又有《變紀》一書，干預時事。函可不行焚毀，自取愆尤。臣與函可有世誼，理應避嫌，情罪輕重，不敢擬議。其僧徒金獵等四名，原係隨從，歷審無涉。臣謹將原給牌文及函可書帖封送內院，乞敕部察議。」得旨：「洪承疇以師弟情面輒與函可印牌，大不合理，著議處具奏。函可等著巴山、張大猷差的當員役拏解來京。」⁶¹

相對於剛過去的江南織造違式事件，清廷對此起「犯僧」案的態度嚴厲得多，下令將函可移送北京審理，並直斥洪承疇玩法徇私，命部院「議處」，即給予處分。函可案一直要到順治五年四月十八日才定讞⁶²。換言之，從本年十一月中到翌年四月中，洪承疇乃待罪之身，行事必須謹小慎微，容不得再有差池。

綜上種種，不難推知，無論從順治四年江南的政治環境、氣氛，或是洪承疇個人的經歷來看，洪承疇包庇牧齋，讓他脫罪的可能性實在不大。袒護、關說之事，要詳察並揣度時勢、利害得失而後行，不犯險；要在適當的時機從容為之，勿招非議。此理至淺，古今一同。試想想，從本年四月開始，江南局勢因吳勝兆反正、通海案暴露而變得異常嚴峻，洪承疇從四月到九月都在全力查辦此事，前後處決了四、五十人。洪承疇本人則在四月陷入反間陰謀，十月被捲入函可案。

⁶⁰ 《實錄》，卷 34，頁 7a-b（總頁 280）。

⁶¹ 同前註，卷 35，頁 2b-3a（總頁 284-285）。

⁶² 《實錄》四月十八日載：「吏部議奏：『招撫大學士洪承疇給廣東遊僧函可護身印牌，負經還里。為江寧守門官兵搜出福王答阮大鍼書並《再變紀》一冊，其中字跡，有干我朝忌諱。承疇以師生之故，私給印牌，顯屬徇情，應革職。』得旨：『爾部所議甚是。但洪承疇素受眷養，奉命江南，勞績可嘉，姑從寬宥。』」同前註，卷 38，頁 4a（總頁 306）。函可最後被流放瀋陽，並圓寂是鄉。關於函可，可參拙著：〈導論：忠義、流放、詩歌——函可禪師新探〉，見嚴志雄、楊權點校：《千山詩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 年），頁 1-56。

對於前者，朝廷到了五月才明確表示相信洪氏的忠誠；由於後者，洪氏十一月間遭朝廷嚴詞譴責，並要給予處分，從此時到翌年四月中，洪氏等待朝廷如何降罪於他。（後來部議相當嚴厲，建議革職。幸帝念洪之勞績，命「姑從寬宥」。）此順治四年一連串事件，都屬政治性質，事關臣民對甫定鼎中原的清政權的屈服或叛逆。清廷緊密監控，態度嚴肅，處理事情的官員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亦不在話下。

牧齋被控告的是曾留黃毓祺宿其家，且許助資招兵的反叛罪，若成立，罪無可恕（從清廷的立場而言）。要知牧齋是以皇清禮部侍郎管內翰林秘書院學士事的身分致仕的人，現今也被逮訊，其案之敏感、嚴重，清廷之不留情面，顯而易見。這樣的人，在順治四年江南政局極其嚴峻且詭異的當下，主審官敢隻手遮天，包庇、釋放他？即便洪承疇有心——他確有禮遇、善待明朝舊人的諸多事蹟——現在時機不對，條件不容許。況且，要是他放過牧齋，還得要上奏皇上，交待情由。這份報告怎麼寫？（相對而言，順治五年，馬國柱接任江南總督之後，條件相對成熟，馬可優為之，也真的幫了牧齋一把，助他脫罪。）⁶³此外，清廷七月十九日宣布，江南總督之位由馬國柱接任，故此在返京以前，洪承疇頓成「代理」，自然也不宜有過於敏感的舉動。

陳寅恪先生相信，牧齋利用人脈關係及人情為己向洪承疇關說求情，於是幸得脫禍。於此一端，陳先生反覆致意。洪承疇與函可有世誼，陳先生認為：「牧齋若經兩人〔案：指林古度、顧夢游〕之疏通勸說，藉黃案以贖前罪，函可亦可能向洪亨九為之解救也。」⁶⁴又認為牧齋討好明之叛族、清之新貴佟國器亦出於同樣目的：「況國器之父卜年與洪亨九同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兩人本有通家之誼，尤便於進說乎？」⁶⁵又指出牧齋還可能求救於時在北京任刑部右侍郎之房可壯（1579-1653），為己在北京交涉活動。不過，關於房可壯，陳先生說：「其時滿人之跋扈，漢人之無權，尚如芝麓所言。何況當房氏任職之際耶？然則房氏在順治四年夏間，以漢族降臣之資格，伴食刑部，自顧不暇，何能救人？牧齋於此，可謂不識時務矣。」⁶⁶

⁶³ 此中條件，還要得力於「會首告謙益從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質，毓祺病死獄中」。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79〈貳臣傳·錢謙益傳〉，頁6577。

⁶⁴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954。

⁶⁵ 同前註，頁980。

⁶⁶ 同前註，頁962。

對於明清二代政局之風雲變幻、所涉人物之力量博弈、歷史事件背後之玄機，陳先生每有令人讚嘆的洞悉及解讀能力。例如陳先生曾指出，後來清廷輕判函可，就有可能爲了「諭慰」洪承疇：「當日承疇處境之艱危，清廷手腕之巧妙，於此亦可窺見一斑矣。」⁶⁷遺憾的是，陳先生只在這裏說了一句「當日承疇處境之艱危」，就戛然而止。對於他認爲在黃毓祺案中舉足輕重、操生殺之權的洪承疇，陳先生竟幾乎完全沒有考論其在順治四、五年間的具體經歷、處境以及其時江南的政治形勢⁶⁸，即遽爾認定牧齋的人情策略奏效，洪承疇包庇、放過了牧齋：「馬國柱不過承繼亨九之原議，而完成未盡之手續耳。」⁶⁹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知道洪承疇當日的處境確實「艱危」，乃至於自身難保，他向牧齋伸出援手的可能性相當低。陳寅恪先生之說，未可遽信。「人情」、「時務」云云，通達與否，確乎繫於智慧，但亦應不悖於事實，有證據幫襯，才能取信於人。

四、陳寅恪「牧齋亦深知能始之詩文無甚可取」說質疑

陳寅恪先生學問淵富，旁徵博引，《柳如是別傳》所用之文獻多樣，材料豐富，後學者望洋興歎，此不待言。然而，陳先生考論牧齋與能始一案，所援用的材料卻相當有限，茲依其於書中出現次序開列如後：

史類：

《明史》卷二八八〈曹學佺傳〉（頁 944）

《南疆逸史》卷十七〈曹學佺傳〉（頁 945）

詩文類：

《牧齋外集》卷二十五〈題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頁 918、946）

《初學集》卷六十八〈題顧與治偶存稿〉（頁 933）

《初學集》所載能始〈錢受之先生集序〉（頁 946）

《初學集》卷六〈曹能始爲先夫人立傳寄謝〉（頁 946）

⁶⁷ 同前註，頁 942。

⁶⁸ 關於洪承疇，陳先生使用的原始材料非常有限，主要據《清史列傳·貳臣傳·洪承疇傳》，用以考辨洪承疇、顧夢游、函可之關係。同前註，頁 933-944。另外據羅振玉編《史料叢刊初編》所載〈洪文襄公呈報吳勝兆叛案揭帖〉（順治四年丁亥七月初十日），以考論牧齋頌繫金陵之年月。見同上書，頁 891-892。

⁶⁹ 同前註，頁 938。

《初學集》卷十六〈得曹能始見懷詩次韻卻寄二首〉（頁 946）

《有學集》卷二十三〈張子石六十序〉（頁 946）

《列朝詩集》丁十四〈曹南宮學佺小傳〉（頁 947）

史類方面，陳先生僅引用二種，一正史，一私史。但如陳先生所言，此類載記，所在多有，類皆陳陳相因，不煩多舉。詩文類方面，除了附見於《初學集》書首能始之〈錢受之先生集序〉外，俱為牧齋本人作品，所據以論述的材料不算豐富，或許是受限於原始文獻不足之故。的確，筆者遍檢能始存世詩文集⁷⁰，與牧齋相關詩文亦未多見；能始為錢母所作傳在集中，但不見其為《初學集》所撰序⁷¹。除上引能始之〈寄題奚川詩為錢受之〉、〈寄錢受之〉二題三首以外，並未發現更多酬贈牧齋之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大概陳先生亦莫之奈何。（其實，能始之詩文集，陳先生曾否寓目，亦不無疑問。）

然而，即便聚焦於牧齋這一方的材料，陳先生所使用者，仍頗有遺漏。要之，陳先生既然認為牧齋其實不甚欣賞能始之詩文，則除《列朝詩集》能始小傳外，自當具審牧齋其他直接述及能始於其時詩壇地位及形象的文獻。可疑的是，陳先生並未論及牧齋作於崇禎十三年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順治五、六年間(1648-1649)《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之〈金陵社集諸詩人〉，以及若干關涉能始文事、舊事之文章片段。對關鍵人物相關詩文作極精微、脈絡化的考辨與詮解本為陳先生獨擅勝場之處，但就牧齋與能始此案而言，未多見陳先生此看家本領。

下文擬先討論牧齋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詠及能始之一首及牧齋此十六絕句之整體意義，以窺探能始於牧齋心目中的地位，並以之指出，陳先生之說有欠周詳。至於如何在此處恰當地展開對〈論近代詞人〉

⁷⁰ 能始存世之詩文集以《石倉全集》最稱完備，現藏日本內閣文庫。此集含一百又九卷，共六十一冊，內容遠超於現時國內所見之十二卷本、二十四卷本、詩稿本、福建叢書本。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度藏此集之影印本，重裝為三十冊。能始存世詩文集之版本及編次比較繁蕪，可參陳慶元：〈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曹學佺《石倉全集》初探〉，收入程章燦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 460-479；許建崑：〈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頁 25-58。

⁷¹ 今見能始詩文集之最後一種為《石倉六稿·古希集》，收入能始七十歲之作。崇禎十七年，國變作，四海焚如。能始於順治三年殉國，下世前一二年之作品不及刻集矣。

的討論，筆者卻頗費躊躇。此十六絕內含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牧齋於組詩中對萬曆以降之茶陵派、復古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其他當代詩家作出評論。如欲飽覽此十六絕所拈出的豐美圖景，以及明瞭能始於此評鑑體系中所占的地位與意義，不宜僅看關於能始的一首。然而，若於此處全面展開對此十六絕的探討，所占篇幅較多，頭緒紛紜，讀者難保不以駢拇枝指視之。有鑑及此，只好割愛，僅集中討論此十六絕之第七首⁷²。

牧齋詩其一至七有一內部統一性、內部邏輯，蓋此七詩詠及之主要人物，依次為姚叔祥(1559-?)、程嘉燧(1565-1644)、湯顯祖(1550-1616)、王穉登(1535-1612)、董其昌(1555-1635)、王惟儉(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袁中道(1570-1623)、馬之駿(1587-1625)、曹能始、尹伸(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1644年卒)。此中人物(除卻馬之駿)，以年齒及聲望論，俱為牧齋之前輩、詞壇宗匠，為牧齋素所敬佩者。

牧齋〈論近代詞人〉詩其七云：

當筵縱筆曹能始，(學佺。)簾閣焚香尹子求。(伸。)蜀道闔山難接席，眼中二老並風流。⁷³

本年正月，牧齋有〈得曹能始見懷詩次韻却寄二首〉之作，詩其二末聯云：「歎息庭梅樹，天涯共一尊。」⁷⁴閏正月，有〈寄西蜀尹子求使君二首〉⁷⁵，詩其二云：

簾閣焚香道氣和，雷琴晉帖手摩挲。詩依歲月偕蒼老，才與功名未折磨。

秋水每將河伯笑，春風自度雪兒歌。輕紅重碧猶能賦，惆悵難隨鳥翼過。⁷⁶
讀之可見牧齋對能始及子求思念之情。

牧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曹南宮學佺〉有云：

〔能始〕為詩以清麗為宗，程孟陽苦愛其〈送梅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各有集，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於

⁷² 筆者另撰有〈從「近代詞人」到「人文世界」：錢謙益〈論近代詞人〉組詩考論〉，本文預計刊登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0期(2020年1月)，頁61-90，比較全面地探論牧齋此十六絕，可參。

⁷³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卷17，頁603。

⁷⁴ 同前註，卷16，頁561。

⁷⁵ 此題詩其一「黃楊節比餘生在」句後有小注云：「時值閏正月。」同前註，卷16，頁570。

⁷⁶ 同前註，頁570-571。

此。而入蜀以後，判年爲一集者，才力漸放，應酬日煩，率易冗長，都無持擇，並其少年面目取次失之。少陵有言：「晚節漸于詩律細。」有旨哉其言之也！⁷⁷

詩中「當筵縱筆」云云，表能始才氣橫溢，揮灑自如，而合此小傳讀，也不無惋惜其應酬日煩而多率易冗長之作之微意在⁷⁸。即便如此，牧齋末句謂「眼中二老並風流」，知其對能始始終敬佩。王士禛(1634-1711)嘗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⁷⁹漁洋謂牧齋一生所折服者，惟湯顯祖與能始，亦可視作能始、牧齋後輩詩家見解之一例。

尹伸，今四川宜賓人。據《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尹布政伸〉：尹初授承天府推官，以南兵部郎出知西安府，以副使提學陝西，以參政備兵蘇松。廉潔彊直，不阿權貴，凡三任，皆投劾去。再起貴州威清道。在行間三年，有功不敘，竟鐫秩以去。以才望起河南左布政，蒞任甫三月，以失禦流賊，解官。牧齋云：「崇禎甲戌[1634]，〔尹伸〕買舟下瞿塘，抵金陵，游吳中、浙西，與余輩飲酒賦詩，留連不忍去。將別，執酒言曰：『生平山水友朋之樂，盡此行矣。餘生暮齒，誓欲買舟南下，更尋吳越之游。所食此言者，有如江水！』歸蜀後，再三附書，諄諄理前約。」又：「讀書汲古，精于鑒賞，日課楷書五百字，寒暑不輟。其老而好學如此。」⁸⁰覽此可知，尹伸固亦高風亮節、風流儒雅、深情款款之人。牧齋稱能始與尹伸爲「二老」，敬爲前輩，明確此點，對我們理解牧齋對能始的態度、書寫方式，至爲重要。

牧齋此十六絕，「近從萬曆數今朝」（詩其二語），月旦近世與當代之詩壇、藝壇人物。依詩之內容、所涉及人物的背景，以及錢曾詩注的導引，此等人物可歸納爲牧齋之文學導師，教已改弦易轍，離棄復古派者：程嘉燧、湯顯

⁷⁷ 錢謙益：《小傳》，頁 607。

⁷⁸ 無獨有偶，鍾惺對此亦略有微言，其與〈與譚友夏〉有云：「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 28，頁 473。此外，陳廣宏論牧齋此評云：「此批評不可謂不重，顯示對大家持更爲嚴苛的標準……。」此一理解甚富啓發性。見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頁 398。

⁷⁹ 〔清〕王士禛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 17，頁 403。

⁸⁰ 錢謙益：《小傳》，頁 643-644。

祖；牧齋景仰之前輩詩人：曹能始、尹伸；吳中詩學繼承人：王百穀；嘉定歸有光(1506-1571)文脈：李流芳(1575-1629)、歸昌世(1574-1645)；復古派以前之文壇領袖：李東陽(1447-1516)；復古派領袖：李夢陽(1472-1529)、何景明(1483-1521)；竟陵派領袖：鍾惺、譚元春(1586-1637)；公安派領袖，反竟陵派者：袁中道；不屑爲竟陵派詩者：馬之駿、王微(1600-1647)、楊宛(Ca. 1600-Ca. 1647)、柳如是(1618-1664)；風雅博物之士：董其昌、王惟儉；當代名家：范景文(1587-1644)、楊補(1598-1657)、周永年、徐波(1590-1663?)；當代選家：華淑(1598-1643)、黃傳祖，共二十餘人。

牧齋宣稱，此十六絕爲「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輩豈我曹」（見詩其二）之作，其所詠者，有素所欽佩之「大雅」之士，也有爲其不禁「嗤點」之人，都關係到「一代詞章」，非比尋常。能始出現在這一組詩，得以側身於此二十餘人中，不就證明，在牧齋的心眼裏，能始在其時文壇是占有重要席位之詩家？在牧齋筆下，能始才華橫溢，當筵縱筆，風流儒雅，是牧齋景仰，但無從「接席」的前輩詩人。

陳寅恪先生考論牧齋與能始的交集，所開示的，本質上是一個政治與宏大歷史的世界。然而，從牧齋此十六絕所呈顯的種種現象可見，此中別有天地，非政治。牧齋與能始畢竟是——或應說，首先是、終究是——文人、詩人，設若我們無視循此二人所可召喚出來的，與政治世界同樣重要、堅實，且充滿意趣與動感的人文、文化、詩文世界，而對二人帶有目的論地切入，遽加論斷，恐怕難免師心自用、以偏蓋全。陳先生對牧齋此一組詩不會陌生，在《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中，就曾論及組詩中的若干首⁸¹。陳先生認爲牧齋並不欣賞能始詩文，僅據《列朝詩集小傳》能始傳文數語立論，無視在〈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中能始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所論有欠周詳。

五、關於晚明閩派詩的一樁公案：牧齋應寫而未寫能始的一個場合

上文探論牧齋詠及能始之一絕，雖重要，但因只寥寥數句，無法完全開顯能

⁸¹ 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7-8、451、453、484等。

始在牧齋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與意義。下文擬援用更多的相關文獻撐開論述的空間，進一步付度牧齋書寫能始真正用力之處及其指歸所在。

牧齋在其著述中其實屢屢提及能始，但我們必須注意，在不同語境中，牧齋對能始的描繪側重不同⁸²。這裏先宕開一筆，討論一個牧齋理應寫而未寫能始的重要場合。這關乎明代文學史上一樁公案。要之，能始乃傑出的閩籍詩人，且對晚明閩詩派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學者普遍有晚明閩詩派「復振」或「中興」的認識⁸³。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牧齋之見解獨異乎是，且未將能始置放於閩詩派的系譜中考量。有論者認為，牧齋此舉，無異蓄意淡化、消解、壓抑閩派於晚明文壇所取得的成就與曾產生過的影響。於此一端，駁議牧齋者代不乏人，於今尤烈⁸⁴。無可否認，牧齋所建構的明代中晚期詩派發展史，確有偏頗之處。就閩派而言，也許是因為閩派的詩學宗尚、理論、交遊曾與復古派諸名家相互淵源，牧齋對閩派頗多貶抑之詞，如云：

自閩詩一派盛行永、天之際，六十餘載，柔音曼節，卑靡成風。風雅道

⁸² 除上文及下所述論的種種語境外，尚可注意此等面向：牧齋述能始論當代人作詩習氣，如〈題胡白叔六言詩〉云：「曹能始見人詩卷，輒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爲此體，熟爛可厭也。」述能始編纂詩選及交遊，如〈題顧與治偶存稿〉云：「今天下文士入閩，無不謁曹能始，謁能始，則無不登其詩于《十二代》之選〔案：指能始所編集之《石倉十二代詩選》〕，人挾一編以相誇視，如《千佛名經》。」述己與能始之文藝交流，如〈陳鴻節詩集敘〉云：「鴻節詩，能始選者爲工，五七言今體尤工。……鴻節將行，余爲略次其生平，與其出游之槩，以敘其詩，且以爲別。屬其歸也，以質諸能始。」述己及能始書寫同一當代人物，如〈紫髯將軍傳〉云：「曹能始敘《邊事小紀》曰：髯之志以報國爲重，而酬知己次之。……暇日攤書，髯所論次方略，依然敝屣蟬蠹中，爲之慨然太息。作〈紫髯將軍傳〉，庶幾後世有論髯之生平而悲其志如能始者。」述能始品藻當代人物，如〈王德操墓誌銘〉云：「曹能始歎曰：『此道人〔案：指王德操〕可以彈缺容目之邪？』」引文分別見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初學集》，卷 86，頁 1812；卷 32，頁 941；卷 73，頁 1633；《有學集》，卷 31，頁 1143。

⁸³ 《明史·文苑傳》云：「閩中詩文，自林鴻、高棟後，閱百餘年，善夫繼之。迨萬曆中年，曹學佺、徐爌輩繼起，謝肇淛、鄧原岳和之，風雅復振焉。」〔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286，頁 7357。另參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338；鄭禮炬：《明代福建文學結聚與文化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999-1001；孫文秀：《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思想研究》，第 3 章〈曹學佺與晚明閩詩派中興〉，頁 91-115。

⁸⁴ 參孫文秀：《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思想研究》，頁 112-115。許建崑也認為：「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故意壓抑閩派的詩學成就，卻做了『曹學佺不屬於閩派之一』的論說。事實上，曹學佺正領導著晚明福建的詩風。」見許建崑：〈萬曆年間曹學佺在金陵詩社的活動與意義〉，《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頁 82。

衰，誰執其咎？自時厥後，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嘖笑盛唐，傳變滋多，受病則一。反本表微，不能不深望於後之君子矣。⁸⁵

又云：「吾謂閩中詩派，宗子羽而禰善夫，以摹倣蹈襲爲能事。」⁸⁶子羽即林鴻（1383年前後在世），明初閩中十子之一，閩派開創者。鄭善夫（1485-1524）則閩派承先啓後人物，明中葉弘治、正德間，與李夢陽、何景明稱十才子，復古派前七子頗視善夫爲同道中人⁸⁷。

牧齋承認閩派有其承傳。《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謝布政肇淞〉云：

肇淞，字在杭，長樂人。……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氣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礱娑盪，如出一手。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於王伯穀，風調諧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伯穀者爲多。在杭之後，降爲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凌夷，閩派從此燿矣。⁸⁸

謝肇淞（1567-1624），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號小草齋主人，晚號山水勞人等。蔡元履，即蔡復一（1576-1625），福建金門人，字敬夫，號元履，官至兵部右侍郎⁸⁹。在牧齋的形容下，謝肇淞雖爲「閩派之眉目」，但其詩之「風調諧合」處，乃學吳中王穉登而得來，言下之意，已非閩詩本色（且其曾「服膺王李」）。蔡復一則「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師法竟陵鍾譚，改卻本來面目，徹底背叛了閩派傳統，閩派亦因之而中斬。

問題在於，謝肇淞與蔡復一是否即能代表晚明閩派詩人？答案是否定的。就明清之際時人公論以及歷史後見之明視之，晚明閩派渠帥實爲鄧原岳（1555-1604）、徐燧（1561-1599）、謝肇淞、徐燊、曹能始——蔡復一決非諸氏之匹。此中諸子，成就最大者，有謂當推能始⁹⁰。要是在鄭善夫之後，續上曹、徐等，則

⁸⁵ 錢謙益：《小傳》，乙集〈高典籍棟〉，頁180-181。

⁸⁶ 同前註，丁集中〈林舉人章〉，頁530。

⁸⁷ 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頁309-319；鄭禮炬：《明代福建文學結聚與文化研究》，頁891-894、995-996；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第3章第3節「鄭善夫與閩詩中興」，頁258-265。

⁸⁸ 錢謙益：《小傳》，頁648-649。

⁸⁹ 關於蔡復一，可參郭黛暎：《竟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蔡復一的詩文人生》（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1年）。

⁹⁰ 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頁321-339；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218-224。晚清閩人謝章铤〈論詩絕句三十首〉有云：「當年鼎足曹徐謝，巨擘還應讓石倉。」「石倉」，即能始。見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頁

閩派香火於晚明非但未「燿」，反而異彩紛呈，且與有明一代相終始，實不容小覷⁹¹。

若然閩派之焰於明季未燿，其於文學史之意義云何？朱彝尊(1629-1709)嘗云：

說詩者遇隆、萬朝士，或置不觀，直以公安、景〔案：當作「竟」〕陵繼七子之派，即愚山〔案：當作「虞山」，即牧齋〕之論，亦不免焉。不知隆、慶諸臣，已力挽叫囂之習，歸于平澹，而定陵初年，人皆修辭琢句，出入風雅之林。……而閩中徐惟和、謝在杭、曹能始，均不為楚咻所奪，未見萬〔歷〕〔曆〕初之不及嘉靖季也。⁹²

朱氏非議牧齋，表彰閩派流衍於萬曆以降詩壇的特殊意義，大有參考價值。

話說回來，關於八閩詩人，牧齋晚年又有一番言論，迥不似先前之苛薄者。上文述及，明崇禎十二年，能始同鄉友徐燊曾攜子存永訪牧齋於虞山。時移世變，又十八年，時值清順治十四年(1657)，牧齋應存永之請，為序其詩集，有語云：

崇禎己卯[1639]，存永侍尊甫興公徵君訪余拂水。……後十餘年，存永偕陳開仲自閩過存，坐絳雲樓下，摩挲沁雪石，周視插架古史舊文，談興公與孟陽遊跡。余為詩曰：「高人有福先歸地，野老無謀但詛天。」酒罷悲吟，敬獻別去。……又七年，以《尺木集》請序。存永之詩，富有日新，至是而大就。哭曹能始長篇，述陽秋、詢琬琰，富矣哉，古良史也！往存永談閩詩，深推其友許有介。頃游南京，見有介詩，每逢佳處，爬搔狂叫，喜存永為知言。乃愾然命筆，為其集序。……嗟夫！讀有介之詩，知閩之才士，與存永爭能鬪捷者，後出而愈奇。……甚矣人才之難盡，而斯人之文心靈氣，未可以終窮也。

又云：

由是觀之，存永之詩不能盡存永，有介之詩不能盡有介，而八閩與天下之詩，心師意匠，新新不窮，其不當以方隅之見，坐井天而窺隙日也，亦若

335 所引。

⁹¹ 可參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第4章第3節「曹學佺、徐燊、謝肇淛的時代」，頁376-422。

⁹² 見〔清〕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卷15，頁441「李應徵」條。

是則已矣。⁹³

牧齋讚賞故人之子存永及其同鄉友許友（有介，1615-1663）之詩溢於言表⁹⁴。牧齋於徐燊小傳中既謂興公於「萬曆間與曹能始狎主閩中詞盟，後進皆稱興公詩派」，而存永乃燊哲嗣，承傳香火者，然則閩中「興公詩派」於今枝苗挺秀矣，明之閩詩派並未灰燼耶⁹⁵？乃知人世多端，情隨事遷，心隨境轉，有執有化。牧齋文字之境地亦復如是，若一味依文求義，便死在句下矣。讀牧齋文字，於其正變虛實處，務須細細研味，語境最是關鍵。

六、國家「海宇承平」與「金陵之極盛」中之曹能始

竊以為，牧齋對能始之賞會，以及能始於牧齋論著中的特殊意義、形象，不能盡在創作實踐或詩派發展的脈絡中求索。要是我們將視線移至萬曆以降更寬廣的人文泉源、文化生產場域、文人交遊情況，將會有更富情味、更形重要的發現。

牧齋未將能始置於閩派的傳承中述論，確是私心作祟，但在檢討復古派後七子領袖王、李歿後文壇嬗變的脈絡中，牧齋曾彰顯過能始的特殊意義，其《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范太學汭〉云：

⁹³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徐存永尺木集序〉，《有學集》，卷18，頁787-788。

⁹⁴ 順治七年，徐存永訪牧齋於常熟，牧齋為作〈閩中徐存永陳開仲亂後過訪各有詩見贈次韻奉答四首〉；〈夏日讌新樂小侯於燕譽堂林若撫徐存永陳開仲諸同人並集二首〉。至於閩籍詩人許有介，牧齋極為欣賞，其〈題許有介詩集〉有句云：「壇坫分茅異，詩篇束筭同。周溶東越絕，許友八閩風。」又有〈再讀許友詩〉，分別見，同前註，卷2，頁77-81；頁80-81；卷8，頁383。此外，牧齋於其纂集之《吾炙集》中收許氏詩逾百首，數量冠絕其他詩人，詩選前後復設贊語，可謂「逢人說許」。上文已述及，陳寅恪先生認為牧齋推譽許氏時正從事復明運動，此亦其「從政治作用出發」之舉措。此可謂又一重公案。本節旨在論述牧齋與閩詩派之關係，而許有介事頭緒紛紜，非三言兩語可能道盡，於此不擬展開討論，請俟他日，幸讀者諒之。

⁹⁵ 關於徐存永於其時詩壇的意義，可參陳慶元：〈徐燊與《懷亭集》〉，見〔明〕徐燊著，陳慶元編：《徐燊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頁6-7。又，關於「興公詩派」的承傳，陳慶元指出：「『興公詩派』的『後進』士子都有誰呢？錢氏沒有記載，目前我們也還找不到很具體的載述。根據現存作品，至少應該有徐燊子徐存永、孫徐鍾震、女婿康季鷹，以及陳鴻、趙之璧、韓錫、孫昌裔、林寵、陳衍、周之夔、安國賢、陳肇曾等。」說可參。見陳慶元：〈前言：徐燊及其詩與詩論〉，載〔明〕徐燊著，陳慶元、陳煒編：《麓峰集》（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頁41。

自王、李之派盛行，海內幾于糜爛，相去四十年，而能始起閩，非熊起新安，允兆起茗，東生〔范汭〕、凝父起吳，希風抗志，在大曆、元和之間。清新安雅，彬彬相命，進而之古，有其端矣。鍾、譚崛起，鬼怪公行，滔滔江河，流而不返，識者有深恫焉。余列諸賢之詩都為一集，使後之觀者，有百年世事之悲，不獨論詩而已也。⁹⁶

在牧齋的描述中，王、李消沉之後，鍾、譚盛行以前，福建曹能始、安徽吳兆（非熊）⁹⁷、浙江吳夢暘（允兆）⁹⁸、蘇州范汭（東生，本浙江烏程人，移居吳）、吳鼎芳（凝父）並起⁹⁹，均一時作手，為詩典雅有則，而各具面目，不主一家一派。由此，也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啓發——牧齋書寫能始，並不措意於能始於個別詩派所代表的意義，其所欲標舉的，是一個時代、世代、人物的意義¹⁰⁰？

⁹⁶ 錢謙益：《小傳》，頁 608-609。

⁹⁷ 錢謙益《小傳》丁集下〈吳處士兆〉云：「兆，字非熊，休寧人。少警敏，喜為傳奇詞曲，游少年場，推為渠帥。萬曆中，游金陵，留連曲中，與新城鄭應尼作《白練裙》雜劇，譏嘲馬湘蘭，青樓人皆指目，有樊川輕薄之名。已而自悔，改弦為歌詩，樸傲初唐，作〈秦淮鬪草篇〉，新安詩派尸祝大函，肥膿相尚，不解為何語。臧晉叔、曹能始見而擊節，遂流傳都下。而能始於非熊尤相得，偕游閩中諸山，及武夷、匡廬、九華，復還白下。其為人率真自放，好窮山林花鳥之致，捉鼻苦吟，貴游雜坐，竟日諷咏，不知有人。久之，別能始歸新安，作〈東歸詩〉。已而復出游，訪故人於嶺南，客死新會。從弟元以其喪歸。非熊詩，評者謂有二種：早年穠華婉至，中歲清真瀟灑。大要沈酣于六朝、唐人，而傳之以性情，幹之以風調，工力並深，興象兼會。雖與能始同調，剪刻鎔鑄，意新理愜，能始似有間焉。能始序其詩，以為古詩學靈運，沿及盧、駱；近體學岑嘉州，字句少實。固宜其知之而未盡也。新安閔景賢采輯皇朝布衣詩，推茗上吳允兆為中興布衣之冠。以予論之，親炙則孟陽，逖聽則非熊，庶無媿於此評。要當與千古共定之爾。」同前註，頁 604-605。此處不嫌文煩，全傳逐錄，以其記載非熊文事及生平生動傳神，又可窺見能始與非熊友誼之深摯有味，復附有牧齋對能始詩歌造詣及論詩得失之評價，相當難得，故錄之以備觀覽云。能始〈吳非熊詩序〉云：「非熊古詩學謝靈運，沿及盧、駱，近體類岑嘉州，字句尚覺實。余愛其未落韻時散吟，如峽猿聲，令人悽絕。登山好窮花鳥之致，其性達生，適意而往，無雜事矣。夫非熊之詩如是也。」見曹學佺：《石倉文稿》（收入《石倉全集》），卷 1，頁 39a。牧齋述引之，有改字的情況。

⁹⁸ 錢謙益：《小傳》，丁集下〈吳山人夢暘〉，頁 605。

⁹⁹ 錢謙益〈吳居士鼎芳〉云：「鼎芳，字凝父，吳人。世居西洞庭，為詩蕭閑簡遠，有出塵之致。與范東生刻意宗唐，刊落凡近，有《披襟唱和集》行世。……凝父與葛震甫稱詩于兩洞庭，皆能祓除俗調，自豎眉目。震甫晚自信不篤，頗折入于鍾、譚；而凝父亭亭落落，迥然塵垢之外。震甫自負才大，以為入佛入魔，無所不可，竟不免墮修羅藕絲中；凝父修聲聞、辟支果，雖復根器小劣，後五百年終不落野狐外道也。」同前註，頁 609。

¹⁰⁰ 先於筆者，陳廣宏即曾指出：「身處流派紛爭的晚明詩壇，錢氏有其策略上的考慮，故竭力消解曹氏的閩派色彩，然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將曹學佺從地方性詩派中拔擢出來，本身

如上文所述，牧齋於《列朝詩集小傳》能始小傳未曾惋惜能始入蜀以後詩有「才力漸放，應酬日煩，率易冗長」之弊。陳寅恪先生即據該傳文數語，斷言牧齋深知能始之詩文無甚可取，其與能始交誼，不過在利用能始「以供政治之活動」。其實，陳先生沒察覺到，牧齋於傳中稱能始詩「清麗」，在《列朝詩集》的整體批評觀中，已是肯定之辭¹⁰¹，而更重要的是，陳先生沒發現，牧齋之評能始，不同時段有不同對待。牧齋致誚於能始，是針對其入蜀任官以後之作。

其實，在一個別具意義的環境中，牧齋曾安置、鋪揚過能始。那裏，有明朝留都金陵的古名城、雅人、雅集、雅遊、詩酒、文宴。那是自萬曆二十七年秋至三十六年冬(1599-1608)能始居官南京時的詩文及人文世界。

萬曆三十六年冬，能始將離秣陵赴蜀任，有〈同社宴別〉詩云：

金燈銀管促飛觴，惜別偏驚寒夜長。四海交游全作賦，十年京國此爲郎。

筵開朱雀帆前月，路指黃牛峽上霜。回首秣陵佳麗地，錦江春色斷人腸。¹⁰²轉任他官，能始盼望久矣，但臨別關情，能始對金陵不盡依依。入蜀後，能始嘗修函致金陵友人，有妙語云：「南曹太閒，西蜀太忙，光景難乎恰好。當時不覺，過後相念，人情之所同然。淮水鍾山，坐享十年之福；峩眉汶嶺，行探一段之奇。」¹⁰³能始治蜀，事務冗繁，此時憶起南京閒曹冷局的歲月，謂反似「坐享十年之福」，令人爲之莞爾。此金陵十載，對我們認識牧齋筆下的能始至關重要。能始爲郎官閒冷，其詩酒場卻煞是熱鬧。竊以爲，牧齋寫能始，其最用力之處，也就是能始與金陵人文世界的相互成就。此乃能始入蜀以前之事，陳先生未曾措意於此。

下面一篇絕妙好辭，也在《列朝詩集小傳》中，乃牧齋頌繫金陵時（或稍後）之作。在牧齋亟寫「金陵之極盛」的語脈中，能始於「空際轉身」。此文獻，陳寅恪先生論述牧齋、能始事，未之引用。牧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李臨淮言恭〉後附〈金陵社集諸詩人〉，云：

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譚者指爲樂土。弘正之間，顧

顯示了他的眼光與器局。」見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頁393。

¹⁰¹ 就能始爲詩宗尚六朝及初唐而言，以及相對於牧齋反覆詬病的復古派的「叫囂」、竟陵派的「鬼語」。而且，《列朝詩集》收能始之詩甚夥，共八十三首。

¹⁰² 曹學佺：《石倉三稿·更生篇（下）》（收入《石倉全集》），詩卷5，頁16a。

¹⁰³ 曹學佺：〈金陵諸友啓〉，《石倉文稿》（收入同前註），卷5，頁5b。

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壇；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翕集，風流弘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曆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子、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還，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嫺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極盛也。戊子中秋，余以銀璫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編，蓋曹氏門客所撰集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舟壑夜趨，飲獵旦改。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繞；華表歸鶴，悵城郭之併非。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我何求，亦無營焉。¹⁰⁴

牧齋形容南京云：「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譚者指爲樂土。」能始於任官南京最後一年有〈金陵戊申元旦書懷〉云：

粉署爲郎無盡期，新年閒思入題詩。帝京佳麗猶如昔，宦況闌珊獨不宜。

曙色已分殘雪徑，春光偏入早梅枝。龍飛甲子頻頻見，鍾阜青葱隱几時。¹⁰⁵

至其臨別之際，有〈復鄉紳啓〉，內云：「十載處閒，實不諳于吏務；一時承乏，斯待罪于仙鄉。事賢大夫，固爲當務之急；樂佳山水，亦遂平生之私。」¹⁰⁶所謂「陪京／帝京」、「佳麗」、「仙都」、「樂土」云云，牧齋與能始時人余懷（1616-1696）《板橋雜記》「雅游」曾恣言之，云：「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髣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眞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¹⁰⁷余懷寫的「雅

¹⁰⁴ 錢謙益：《小傳》，頁 462-463。

¹⁰⁵ 曹學佺：《石倉三稿·更生篇（下）》（收入《石倉全集》），卷 5，頁 3b-4a。能始七十歲時有〈寄林茂之〉云：「聞道江南武備疎，六朝佳麗亦無餘。聖明注意陪京切，根本難容勝筭虛。秦寇于今成楚寇，軍儲強半掠民儲。媿無奇策能匡救，祇向芸窗學蠹魚。」見《石倉六稿·古希集》（收入同上書），頁 23b-24a。

¹⁰⁶ 曹學佺：《石倉文稿》（收入同前註），卷 5，頁 1b-2a。

¹⁰⁷ [清]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7。

游」，實乃南京文士曲中妓家之冶遊。牧齋說的「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譚者指爲樂土」與余懷說的「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其實是有交集的（讀下文所引述相關諸小傳即可知）。不過，牧齋於此，所欲突顯的是金陵的人文世界及其文化、文學圖景。

牧齋是如何形塑這一段將近百年的、特殊的文化記憶的呢？首先，在其外觀上，有一個歷史分期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的框架。於此歷史視野中，金陵文士雅集、流傳篇章，曾歷經「三盛」——嘉靖中後期，朱曰藩（子价，1522-1561）、何良駿（元駿）等人授簡分題，徵歌選勝，雅集唱酬，帶來「金陵之初盛」¹⁰⁸；萬曆初年，陳芹（寧鄉）等修青溪之社，軒車紛遯，唱和頗煩，締造了「金陵之再盛」¹⁰⁹；「再盛」之後二十餘年，出現了「金陵之極盛」，此風雅盛事的靈魂人物就是曹能始。能始入仕不久，即「左遷」¹¹⁰，被貶調金陵，前後長達十年，也真委屈了他。但閒曹冷局，並非沒有好處，尤其是在南京。能始本就好交遊、好文，現在每天有的是時間，於是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與縉紳、布衣之士頻繁往來，熙熙攘攘，一時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成就了「金陵

¹⁰⁸ 錢謙益《小傳》丁集上〈朱九江曰藩〉云：「曰藩，字子价，寶應人。按察使應登字升之子也。……當李、何崛起之日，南方文士與相應和者，昌穀、華玉、升之三人，而升之尤爲獻吉所推許。子价承襲家學，深知拆洗活剝之病，於時流波靡之外，另出手眼。其爲詩，取材文選、樂府，出入六朝、初唐，風華映帶，輕俊自賞，寧失之佻達淺易，而不以割剝爲能事。其於升之，可謂諍子矣。……嘉靖戊午、己未間，子价在南主客，何元朗在翰林，金在衡、陳九臯、黃淳甫、張幼于皆僑寓金陵，留都人士金子坤、盛仲交之徒，相與選勝徵歌，命觴染翰，詞藻流傳，蔚然盛事，六朝之佳麗，與江左之風流，山川文采，互相映發，不及百年，蕩爲禾黍。西京之歡娛，東都之燕喜，邈然不可以再睹矣！錄子价詩，冠于金陵諸賢之首，不能不爲之一嘆云。」（頁448-449）同集〈何孔目良俊〉云：「元朗風神朗徹，所至賓客填門。妙解音律，晚畜聲伎，躬自度曲，分刊合度。秣陵金閭，都會佳麗，文酒過從，絲竹競奮，人謂江左風流，復見於今日也。」（頁450-451）

¹⁰⁹ 錢謙益《小傳》丁集上〈陳寧鄉芹〉云：「芹，字子野。系出交南國王，永樂中，避黎氏之亂來奔，遂家金陵。……卜築新林別業，近新林浦謝玄暉題詩處，又于桃葉淮清之間，起邀笛閣，招延一時勝流，結青溪社，每月爲集，遇景命題，即席分韻，金陵文酒觴詠之席，於斯爲盛。相延五十年，流風未艾。承平盛事，至今人豔稱之。長年市兒，猶能指點其處云。」同前註，頁459-460。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四「陳芹」條下云：「錢氏序金陵社集詩云……覽其文者，謂淋漓盡致，盛衰今昔之感，具於是矣。然錢氏攷之未得其詳，『青溪社』集，倡自隆慶辛未，而非萬（歷）〔曆〕初年也。」後附朱秉器所撰〈停雲小志〉，朱氏所據以辨正牧齋者也。文長不錄。見朱彝尊著：《靜志居詩話》，頁403-404。

¹¹⁰ 能始〈陳大理詩序〉云：「己亥歲，予左遷南大理。」見曹學佺：《石倉文稿》（收入《石倉全集》），卷1，頁63a。

之極盛」¹¹¹。

再細審之，在牧齋的歷史脈絡化處理中，嘉靖中葉「初盛」以前，還有「弘正之間」一段「前史」。此中上下時段，亂縷而言之：明孝宗弘治朝享國十八年(1488-1506)；武宗正德朝享國十六年(1506-1522)。世宗嘉靖朝享國四十五年(1522-1567)；嘉靖後為穆宗隆慶朝，僅六年(1567-1573)。神宗萬曆朝為有明一代享國最長久者，共四十八年(1573-1620)。若從弘治、正德之交(約1506年前後)算起，經過嘉靖、隆慶，至能始萬曆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1599-1608)間任官南京，期間約合百年。復次，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弘、正之間為一百三十八年；弘、正之間至崇禎十七年(1644)明亡，亦恰是一百三十八年。換言之，牧齋所謂之「海宇承平」之世，始自明朝中葉，至能始主導之「金陵之極盛」出現時，正值萬曆中晚期。此百年之世，對許多明清士人而言，有一種特殊的情感與象徵意義在，蓋有謂此乃明朝之「盛世」也¹¹²。牧齋本人在明亡以前及以後，在不同的語境中，就屢屢稱萬曆朝為「全盛之世」，如云：「國家休明昌大之運，自世廟〔嘉靖〕以迄神廟〔萬曆〕，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¹¹³或云：「神廟中年，號為極盛。」¹¹⁴循此思之，在牧齋心目中，「金陵社集諸詩人」乃是在此一盛世中舉行燕集唱和活動的。然則金陵社集之「極盛」與國家鴻運之「極盛」互相表裏，而曹能始為金陵社集「極盛」的主導人物，其所承載之象徵意義不亦大矣哉！

¹¹¹ 曹能始與「金陵之極盛」比較詳細的研究，可看孫文秀：《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思想研究》，第2章〈曹學佺引領『金陵之極盛』與晚明金陵詩壇之興盛〉，頁34-90；許建崑：〈萬曆年間曹學佺在金陵詩社的活動與意義〉，《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頁59-82。

¹¹² 關於萬曆「盛世」的歷史與文化記憶，可參何冠彪：〈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明、清之際士人對萬曆朝的眷戀〉，《九州學林》第3卷第3期(2005年秋季)，頁85-115。何文指出，所謂「明亡於萬曆(1572-1620)」之說，並非清初士人的共識，實乃清人編修《明史》等官書時，漸次形塑出來的觀念。實際上，揆之於明清之際許多詩文，萬曆朝乃士人眷念的黃金時代，此不因其人之年齡差距或身分屬性(遺民或貳臣)而有所不同。何文從多個角度，包括：朝政與吏治、人才與士風、民情與風習、生活與經濟、詞林與藝苑等，列舉大量文獻，從而呈顯明清之際士人如何談論與追懷萬曆為有明一朝之盛世。牧齋的著述為何文引證的重心之一，下文所述二條牧齋材料，即見於何文文首，不敢掠美，特此說明。

¹¹³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申公神道碑銘〉，《初學集》，卷65，頁1509。

¹¹⁴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博文恪公文集序〉，《有學集》，卷16，頁736。

南京的文化、文學底蘊悠久深厚，此不待言，而明嘉靖、萬曆以降，「陪京」之所以為「仙都」、「樂土」，除因其時「海宇承平」外，「江山之助」亦不可或缺。牧齋謂「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翕集，風流弘長」、「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就表出鍾靈毓秀的意思。易言之，此間地之靈秀與人之風華交相輝映，自然與人文互為煥發。文中提到的「秦淮」、「桃葉」、「石城」、「笛步」、「青溪」、「冶城」、「臺城」、「新亭」，俱金陵名勝古蹟，都是騷人墨客文思詩興的泉源，「仕宦者」及「游譚者」於彼處流連遊宴，賦詩結社。

然而，無論江山是如何的多嬌，要是無人（作為作者）感應、作用於斯，斷無篇翰誕生的可能。金陵詩社的盛事，就是由若干活躍於「文化場域」中的「行動者」與眾多的參與者所共同締造的。此中人物的身分、階級，要言之，有「仕宦者」與「游譚者」，而其人或「寓公」，或「地主」，或「旅人」，又有秦淮「諸姬」，不一而足。「仕宦者」中，帶來「金陵之再盛」的陳芹退官後卜居邀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一時「舊老」、「勝流」咸集，軒車紛遯，盤游者眾。其後廿載，曹能始「迴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一眾「縉紳」與「布衣」文酒唱和，命觴染翰，蔚為「極盛」。由是觀之，金陵之「再盛」與「極盛」，主要是由「仕宦者」（以及「致仕者」）所促成的，苟無如陳芹、曹能始等人蒞臨，金陵社集不會如斯之盛。

再者，無論是「仕宦者」抑或「游譚者」，在此金陵數盛中，其共同的身分是「詩人」，其創作場合是「社集」。牧齋文中所述之「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也就是不同的社集。此等文士採用的文類、載體、形式並無稀奇之處：「初盛」前弘治、正德間，有「以文章立壇」，或「以詞曲擅場」；嘉靖中「初盛」時，「相與授簡分題」，以寫作詩歌為主。萬曆初年，青溪之社「唱和頻煩」，唱和詩仍是「再盛」最主要的產品。萬曆初「再盛」後二十餘年，曹能始帶來「金陵之極盛」，其時能始「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交際、出遊至為頻繁，於是「臺城懷古，爰為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無怪乎「筆墨橫飛，篇帙騰湧」，蔚為大盛。值得注意的是，牧齋述萬曆初之「再盛」，謂青溪社之作「雖詞章未嫺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究其實，金陵詩社各盛的作品都應作如是觀。此等詩作，乃太平盛世文士宴遊酬唱的產物，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大雅」的企圖。

總言之，牧齋在滄桑國變、身世多艱之際撫今追昔，回味金陵這一幕幕燦爛的人文雅集、詩文波瀾，無異於追憶明朝中葉至萬曆朝百年間南京的昇平歲月與別具特色的文化進程。在此一帶有文化史、社會史、士人交遊史向度的視野中，牧齋彰顯的是豐富活潑的人文世界，追懷的是文士「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的風流韻事、承平佳話。

金陵社集極盛之時，正值明朝盛世。萬曆以後，明朝迅速走向滅亡。牧齋云：「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舟壑夜趨，飲獵旦改」，即隱喻著明朝景命潛移，盛極而衰。又云：「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繞；華表歸鶴，悵城郭之併非」，猶言明社已覆，江山易主，土地人民無所歸。無怪乎牧齋記述金陵社集至文末，感慨萬端，回首惘然，云：「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我何求，亦無營焉。」牧齋堪稱一代史家、大詩人，又是萬曆朝過來的人，此際追懷往昔的美好歲月與夫業已失去的人文溫度，難怪濃筆厚墨，特別深刻用情。曾幾何時，牧齋自己也是明季之「仕宦者」、「游譚者」，清流領袖，朝野矚目，而撰文之際，卻已經歷了降清、仕清之不堪事，清譽不再，又被捲入黃毓祺案，官司未結，驀然回首，能不惘然？

牧齋對金陵文人社集的刻劃形容尚有「後史」，有必要再稍加論述。在《列朝詩集》中，「金陵社集諸詩人」後，又附「白門新社諸詩人」，所述記者，乃曹能始離開後南京詩社的後續發展。牧齋序云：「萬曆末年，閩人謝維輯《白門新社詩》八卷，凡一百四十人。金陵之耆宿，與四方之孝秀，皆與焉。採而錄之，得二十餘人，附『金陵社集』之後。」¹¹⁵

竊以爲，牧齋安排「金陵社集諸詩人」與「白門新社諸詩人」在《列朝詩集》中相繼出現，不無使涵蓋時段由弘、正之間、萬曆中葉延伸至萬曆晚期的深意在。而且，此一敘事策略，對牧齋形塑明朝盛世之終始與己之承運參與、「敬陪末座」不無關係。

我們記得，上述「金陵社集諸詩人」是附在「李臨淮言恭」詩選後的。〈李臨淮言恭〉小傳云：

言恭，字惟寅，岐陽武靖王之裔孫也。萬曆二年，襲封臨淮侯，環衛扈從，屢荷恩眷，以勳戚留守陪京，位元戎列師保，累年而後卒。李氏自岐陽父子，已好文墨，親近文士。惟寅沿襲風流，奮跡詞壇，招邀名流，折

¹¹⁵ 錢謙益：《小傳》，頁466。

節寒素，兩都詞人游客，望走如驚。子宗城，字惟蕃，亦有文好事，東封之役，奉使不終。家于金陵，賦詩結社，徵歌選妓，有承平王孫之風。惟寅詩風氣婉弱，時有韻致，送安茂卿詩云：「夢回芳草遠，人去落花多。」藝苑至今傳之。汝蕃以敏捷自誇，其佳句如〈秋夜〉云「醉後晚鐘頻入枕，夢回寒月半當樓。」〈贈汪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闊，愁來霜逐鬢毛新。」皆可誦也。¹¹⁶

「白門新社諸詩人」則有〈齊王孫承綵〉小傳，云：

承綵，字國華，齊藩宗支，散居金陵。高帝子孫，于今為庶，國華獨以文采風流，厚自標置，掉鞅詩壇，鼓吹騷雅。萬曆甲辰〔三十二年，1604〕中秋，開大社于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于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咸相為緝文墨、理絃歌，修容拂拭，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豔稱之。其詩亦殊清拔。「天迥孤帆沒，江空獨雁寒。」所謂送別登樓，俱堪淚下者也。¹¹⁷

此二傳之文辭、結構、內容近似。要之，李言恭、朱承綵為明室王權的延展與象徵，二人又酷好斯文，為文藝活動積極的參與者與推手，儼如騷壇領袖、風月總管。

李言恭、朱承綵居停南京的年月，實與曹能始任官南京的時日相近。然則能始帶動「金陵之極盛」之時，言恭、承綵也主持騷雅，賦詩結社，亦可謂「承平盛事」。諸氏一時交相激盪，皆有圭角崢嶸之氣象。文壇風會與國家元氣互動互為、文苑盛衰實為時兆，此乃牧齋文學理論、文學史觀一個鮮明的側重¹¹⁸。由此覘之，牧齋在《列朝詩集》中對「金陵社集」、「白門新社」的鋪陳處理，其實也寓有此一國運文運相交乘除之意。

白門新社諸詩人中，頗有與牧齋交遊者。牧齋記述諸人事蹟，無疑也在側寫自己。其實，「金陵社集諸詩人」之最後一人已與牧齋有所交集。牧齋於胡潛小

¹¹⁶ 同前註，頁 461-462。

¹¹⁷ 同前註，頁 471。

¹¹⁸ 牧齋之詩文論中，有文學與「世運」互為作用之強調，如〈劉司空詩集序〉云：「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見《初學集》，卷 31，頁 908-909。）又如〈徐司寇畫溪詩集序〉云：「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閹寺鉤黨凶裁兵燹之禍，亦相挺而作。」（見同上書，卷 30，頁 903。）另可參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頁 269-271；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201-214。

傳中云：「潛……善談諧，年八十餘，耳聾目眇，猶多微詞，口吃吃笑不休，屬余序其詩而未果也。」¹¹⁹至「白門新社諸詩人」時期，牧齋與諸詩人的交集更歷歷可尋。此一部分含十六小傳，文內反映牧齋與彼等有交誼者凡四見。〈胡布衣宗仁〉有云：「有詩二千餘首，鍾伯敬爲論定，余見其手藁，每自誇其『寒星徹夜疎，明月爲我至。』以爲神來之句，亦可見其清意也。」¹²⁰〈黃山人世康〉有云：「世康……製孟姜女廟碑，余亟賞之，作長歌以贈，淮揚間人用是多乞其文。」¹²¹〈鄭太守之文〉有云：「之文，字應尼，南城人。公車下第，薄游長干。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爲文字飲，頗不禮應尼。應尼與吳非熊輩，作《白練裙》雜劇，極爲譏調……。定襄傅司業清嚴訓士，一旦召應尼跪東廂下，出銜袖一編，擲地數之曰：『舉子故當爲輕蚨蝶耶？』……應尼舉進士，傅公爲北祭酒，介余往謝過，公一笑而已。……崇禎末，余作長歌寄之，有曰『子弟猶歌白練裙，行人尚酌湘蘭墓。』應尼亦次韻相答，是後寂不相聞矣。」¹²²〈黃監丞居中〉有云：「居中，字明立，晉江人。……弟虞稷，能繼其家學，余采詩于白下，盡發其所藏，以資披擷，又汲汲表章父兄之遺文，其有志如此。」¹²³〈沈秀才春澤〉有云：「春澤，字雨若，常熟人。……余愛其才，而憫其志，繙閱其詩二千餘首，才情故自爛然，率易叢雜，成章者絕少。士之負才自喜，而不知持擇，迄以無成，良可悲也！」¹²⁴藉此不難窺見，牧齋或未直接參與「金陵社集」、「白門新社」之雅會，但於此「海宇承平，陪京佳麗」的人文世界中，牧齋乃一活躍的行動者，有一席之地。

《列朝詩集》的編輯體例是「以詩繫人，以人繫傳」¹²⁵。牧齋在集中以「詩社」作爲組織框架以記述社集群體並載錄諸人之詩，僅此一例，其實是「變例」，足見牧齋對此之重視。

復次，承上所論，牧齋之敘寫金陵社集、白門新社，檢點文壇、數風流人物而外，實寓有歌頌與追懷萬曆一朝爲國家盛世之意。如此，則文學、人文世界與

¹¹⁹ 錢謙益：《小傳》，頁 465。

¹²⁰ 同前註，頁 467。

¹²¹ 同前註，頁 469。

¹²² 同前註，頁 470。

¹²³ 同前註，頁 471-472。

¹²⁴ 同前註，頁 472-473。

¹²⁵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列朝詩集序》，《有學集》，卷 14，頁 678。

歷史世界重疊交加起來。牧齋乃史家，尤以撰述有明一代之史為職志，加之《列朝詩集》本就有「以詩存史」的企圖¹²⁶，牧齋述論此中人物、文事，實兼有史的向度，意義非比一般。

再者，金陵社集三盛中以曹能始所領導者為「極盛」，牧齋以如椽大筆述寫之，酣暢淋漓。金陵社集之後為白門新社時代，牧齋實側身其中。牧齋形構此段文化進程，可謂有人有我，並非尋常筆墨。

牧齋〈曹南宮學佺〉云：「家居二十餘年，殉節而死，年七十有四。」能始歿於順治三年。《列朝詩集》約於順治六年間編撰完成¹²⁷，牧齋之能始小傳撰於順治三年至六年間可知。〈金陵社集諸詩人〉有云：「戊子中秋，余以銀璫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編，蓋曹氏門客所撰集也。」則本文很有可能即撰於順治五年牧齋頌繫金陵期間，至遲不會晚於順治六年，其作期及撰作因緣比〈曹南宮學佺〉小傳更能確定。由上文所論可知，牧齋之〈金陵社集諸詩人〉實乃吾人瞭解能始在晚明文壇所占的地位以及其在牧齋心目中之形象、分量至為重要的文獻。陳寅恪先生掂量牧齋筆下之能始，卻未見引用此文。豈陳先生以此文無牧齋利用能始「以供政治之活動」之消息，故略而不論？然則陳先生亦知牧齋之論能始，有非出於政治目的者歟？

《列朝詩集》徹簡於順治六年，即付梓人。上述諸種與能始相關之材料，固成於本年以前。又十年許，牧齋作〈稼菴近草序〉（文末署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季春二十有一日），內云：

往者承平之世，臨川、雲松、公安諸公，狎主詞壇，風流弘長。自時厥後，閩有能始，楚有小修、伯敬，燕、齊有敬仲、德水，皆以文章為心髓，朋友為性命。而余以菰蘆下士，參預其間。於時海內才人勝流，咸有依止。箕風畢雨，燕函越縛，郵筒交馳，弓劍相錯。盛矣哉！彼一時也。人代貿遷，朋舊凋落，老而不死，為斯世陳人長物。風流文雅，追念昔遊，如巡舊識，如記昔夢。¹²⁸

牧齋此段文字大好，人老，筆老，火氣盡斂。牧齋於此追念昔遊，記敘承平之世文壇宗主湯顯祖、藩士藻（雪松，1539-1602）、公安三袁、曹能始、鍾惺、劉

¹²⁶ 同前註。

¹²⁷ 牧齋〈列朝詩集序〉云：「托始於丙戌[1646]，徹簡於己丑[1649]。」同前註。

¹²⁸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雜著·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頁420-421。

榮嗣（敬仲，1570-1638）、盧世澐（1588-1653），而絲毫不摻任何月旦人物或評論各家高下優劣之念，非如往昔之有軒輊於其間。牧齋撫今追昔，此等舊友，全為「以文章為心髓，朋友為性命」之善士、雅人。（此亦牧齋之「晚年定論」耶？要知牧齋曾誣鍾惺為「詩妖」，乃亡國之兆。）¹²⁹

能始集中有一小文，題為〈題鍾伯敬錢受之詩卷跋〉，於此不妨參看：

伯敬、受之與菴和為素心之友¹³⁰。此卷前後為二兄書與菴和倡和詩，而伯敬者最多。雖然，伯敬已矣，吾猶恨其少也。受之與予具有後死之責，更當何日與菴和日夕酬倡，盈累篇牘，書之不盡者乎？予時為菴和跋伯敬詩畫者三，而此卷則不能不惡乎涕之無從也。¹³¹

伯敬與牧齋為「素心之友」？今之治明清文學批評而及虞山之攻伐竟陵者，見之未知作何感想？竊嘗謂人之著書立言（並有讀者訴求，且謀傳諸後世者），乃有為而作，與己意見不合者，如臨大敵，筆下或曲折針對之，或猛衝其人，此乃「公領域」機制之牽引也。而彼等素常交遊應酬，卻有可能在同一朋友圈，見面時倒一團和氣，十分和諧，內心並無真正之仇恨在，此其「私領域」之實況也。能始「素心之友」云云，牧齋謂彼等及己「皆以文章為心髓，朋友為性命」，不正鄙說之一佳證歟？

話說回來，閩人曹能始，在牧齋暮年回憶中，再次側身於此等「狎主詞壇」的宗匠之列，這不就足以證明，牧齋始終推崇能始？（牧齋撰〈稼菴近草序〉時七十七歲，距其頌繫金陵已十年。）上述〈稼菴近草序〉一段文字，亦未見陳寅恪先生援用。

¹²⁹ 可參拙文：〈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新議〉，《牧齋初論集》，頁1-42。

¹³⁰ 「菴」為「孟」之異體。孟和，即閩籍詩人商家梅（?-1637），其與鍾惺及牧齋之交情甚深厚。錢謙益《小傳》丁集下〈商秀才家梅〉略云：「家梅，字孟和，閩縣人。萬曆末年，游金陵，與鍾伯敬交好。伯敬舉進士，從之入燕。馬仲良權關游墅，偕仲良之吳門。其交于余也，以鍾馬，而其游吳中也，最數且久。居閩之日，與游吳相半，則以余故也。孟和少為詩，饒有才調，已而從伯敬遊，一變為幽閒蕭寂，不多讀書，亦不事汲古。鐵心役腎，取給腹笥，低眉俯躬，目笑手語，坐而書空，睡而夢盡，呻吟咳唾，無往非詩，殆古之詩人所謂苦吟者也。崇禎丙子，自閩入吳，馮爾賡備兵太倉，好其詩而刻之。明年，余被急徵，孟和力不能從，而又不忍余之銀鑪以行也，幽憂發病，死婁江之逆旅。」（頁588-589）

¹³¹ 曹學佺：《石倉三稿·西峰集》（收入《石倉全集》），文上，頁43a。此文之前一題為〈題鍾伯敬畫跋〉，有云：「噫！惟有真朋友，迺有真詩畫也。」見同上書，文上，頁42b-43a。能始此語與上文所述順治五年牧齋〈題曹能始壽林茂之六十序〉謂「天下有真朋友，有真性情，乃有真文字」云云，何其相似！

陳先生認為牧齋褒揚能始踰越分量。竊則以為，從上文所述相關文獻可見，能始於牧齋之心目、回憶中極有分量，且首尾一貫。牧齋之寫能始，是否如陳先生所言完全出於政治動機，文獻俱在，讀者自行判斷可也。愚見以為，至少從崇禎十三年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至順治五、六年間之〈金陵社集諸詩人〉，以迄於順治十五年之〈稼菴近草序〉，由明末而清初，時間橫跨近廿載，牧齋的論調、觀點、情感始終是一致的。於此一端，陳先生為何漠然置之，不贊一詞？莫非此中情實，與其所持之立論相衝突，故選擇視而不見？古今著述之利病得失，吾人實宜細心參究。

七、諸家論曹能始於明清之際詩歌史上之地位

陳寅恪先生論牧齋之過譽能始，用心實在考述黃毓祺案所折射出來的、涉及牧齋的政治力量與人事關係、斡旋。然而，陳先生的議論，似乎還有一個「前理解」，即能始詩文不過爾爾，此牧齋亦知之，其推獎能始，非關文藝。此一看法，以一家之言視之，固無不可，但若詢諸明清以迄當世之詩學方家，可能不會苟同。我們稍觀牧齋以外，明清之際別的詩家以及今之治明清詩者的見解，便可分曉。

湯顯祖(1550-1616)曾並稱能始與袁宏道(1568-1619)之詩，其〈雲聲歌寄宜興張文石，并懷能始中郎三首〉其三云：「新來好句得曹袁，翠冷珠輝整欲言。更作清微河漢語，秋聲移動白雲痕。」¹³²朱彝尊《明詩綜》載錄與湯氏同輩名士評論二則。葉向高云：「能始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及王、韋，其旨沉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冷而曠絕。其初為眾所譁，久而世稱之。」¹³³朱謀埠（鬱儀，1552?-1624）云：「能始天才典贍，研討精深。軒輊三唐，吐納漢晉。貌境必似，造語斯真。氣峭以潔而操調極平，意鍛以鍊而摛辭若樸。興會所至，神情獨往。」¹³⁴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明三百年詩凡屢變。洪、永諸家稱極盛，微嫌尚沿元習。迨「宣德十

¹³² [明] 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21，頁895。

¹³³ [清] 朱彝尊輯錄：《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74，頁3667-3668。

¹³⁴ 同前註，頁3668。

子」，一變而為晚唐。成化諸公，再變而為宋。弘、正間，三變而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變而為初唐。皇甫兄弟，五變而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變矣。久之，公安七變而為楊、陸，所趨卑下。竟陵八變，而枯槁幽冥，風雅埽地矣。獨閩、粵風氣，始終不易。閩自十才子後，惟少谷小變，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謝在杭、徐惟和輩，猶然十才子調也。粵自五先生後，惟蘭汀小變，而歐楨伯、黎維敬、區用孺輩，猶是五先生之調也。能始與公安、竟陵往還唱和，而能矚然不滓，尤人所難。¹³⁵

朱氏從宏觀角度，表出能始與閩派詩於有明一代詩歌發展進程中的特殊地位與意義，識見不凡。

王士禛《池北偶談》論能始云：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啓、禎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參政，與監司謁撫按，必於館中別設一几，隸人置書几上，對眾一揖，即就几披閱，不交一言，其孤亢如此。晚年大節如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¹³⁶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啓、禎間，無詩」云云，漁洋山人晚年大放厥辭，不必當真，但其對能始推崇備至，則明甚（曹、王二家，都以唐音安身立命，是同道中人）。漁洋謂牧齋一生所折服者，惟湯顯祖與能始，尤可佐證本文之主張。

王夫之(1619-1692)於其編選之《明詩評論》收能始詩甚夥，其評能始詩最精妙入微。如王氏評能始〈隴頭水〉云：「似此可云風骨。」¹³⁷評〈宿范東生池上〉云：「閩人詩多清弱。似此清亦不弱，高棟、王偁、鄭善夫之所畏也。」¹³⁸評〈再送宣仲〉云：「起落來回，通身是神力所舉，故曰閩詩唯公不弱。」¹³⁹評〈晦日〉云：「結束平淨。此不肯為唐人五言古詩者。李于鱗空有其言，示之

¹³⁵ 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卷21，頁636-637「曹學佺」條。

¹³⁶ 王士禛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卷17，頁402-403。

¹³⁷ [清]王夫之評選，李金善點校：《明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80。

¹³⁸ 同前註，頁309。

¹³⁹ 同前註，頁310。

以此，亦未知賞。」¹⁴⁰ 評〈寄錢受之〉云：「古今人能作景語者百不一二。景語難，情語尤難也。……倥傯訟理，唐人不免，況何大復一流，冲喉直撞，如里役應縣令者哉！先生尤工于言情，縈紆曲盡，〈谷風〉、〈蟋蟀〉之後，不愧古人矣。」¹⁴¹ 評〈喜茂之至有述〉云：「幽細狷潔，或疑石倉詩頗爲竟陵嚆矢者在此；乃其端重有局度，自然君子之章，竟陵不得而借也。石倉氣幽，竟陵情幽。情幽者，曖昧而已。」¹⁴² 評〈沙溪別東生〉云：「此不可喝作晚唐。看他入手大，運局高，賈長江終身未逮。石倉不從晚唐入，石公〔袁宏道〕不從白、蘇入，若士〔湯顯祖〕不從三謝入，是以招得古人生魂，北地、信陽、歷下、琅琊、竟陵、山陰皆旁門漢，不已，且學光孟祖迫從狗竇。」¹⁴³ 王氏諸評，或拈出能始詩之藝術特色，或置其詩於閩詩傳統中衡量，或將之與復古派、竟陵派比較評論，都滿是讚美之詞。

至若今之治明清詩文之專家，也有亟賞能始及八閩詩人者，如陳廣宏斷言：「曹氏在晚明堪稱大家。」¹⁴⁴ 又如李聖華云：

王士禛欣賞學佺山水佳句，亦未免「蔽于一見」，如視陳子龍、程嘉燧爲明末七律兩大家。事實上，嘉燧不副此盛名，學佺真堪與子龍齊驅，《明三十家詩選》並列陳、曹，爲選詩數量相當，《明詩紀事》辛簽卷一只錄陳（三十八首）、曹（三十二首）兩家，當是深具慧眼。¹⁴⁵

又云：

綜觀明詩史程，晚明閩派尤占比重。後七子派式微時，閩中與浙東壇坫勃興，共同奠定了詩壇新格局。公安、竟陵派相繼而起，閩派占據一方壇坫，氣勢上等觀吳中、浙東。明末，竟陵、幾社並馳，閩派構成詩界第三支生力軍，以自成一家言的詩論和創作標幟八閩，促使閩詩蔚然大觀。¹⁴⁶

¹⁴⁰ 同前註，頁 192。

¹⁴¹ 同前註，頁 311。

¹⁴² 同前註，頁 192。

¹⁴³ 同前註，頁 310。

¹⁴⁴ 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頁 392。

¹⁴⁵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頁 221-222。

¹⁴⁶ 同前註，頁 224。

八、結論

牧齋涉及資助黃毓祺招兵謀反，江南總督馬國柱最後以錢、黃二人「素不相識」上奏朝廷，牧齋因而獲釋。這個結果讓人頗覺詫異，因錢、黃二人素有交情，且錢曾留黃宿其家，這些證據不難查得（今天仍可看到相關文獻）。循此思之，陳寅恪先生以牧齋得以脫禍是「由於人情，而不由於金錢」的想法是不無道理的。可惜的是，陳先生一開始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誤判牧齋是在順治四年被逮繫南京。順治四年任江南總督的是洪承疇。陳先生順著「人情」及「政治社會關係」思考，並在「家族姻戚鄉里師弟及科舉之座主門生同年等」的脈絡中，建立起「錢牧齋—曹能始—洪承疇」的關聯，並提出牧齋「推崇曹能始踰越分量」一說。由於陳先生錯判了牧齋涉案的年月，他環繞「錢牧齋—曹能始—洪承疇」此一邏輯所作的建構都屬捕風捉影（牧齋是在順治五年才頌繫金陵，其時的江南總督已是馬國柱），本來沒有重提此一公案的必要。然而，筆者並沒有站在歷史後見之明的優勢位置，對陳先生環繞本案所作的考論漠然置之，因為筆者認為，陳先生所揭櫫的「政治社會關係」確是研治明清文史的重要法門。再者，著述之事，儘管主要論點不能成立，局部與細節的論證可能還是很有價值、很有啟發的。筆者選擇往陳先生此一「虛擬」的歷史時空走一遭，希望瞭解陳先生如何思考、如何布置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揣摩牧齋對能始的推崇是否真的言不由衷。茲總結本文探求所得如次：

陳先生認為牧齋在頌繫金陵期間述及能始，是爲了向洪承疇示好，冀其助己脫難。陳先生又下了一個大判斷，認為牧齋與能始在前明所有的友誼互動以及詩文酬贈，都非出於對能始文藝的欣賞，僅是利用能始從事政治活動而已。筆者因而細按能始在晚明的仕宦履歷，評估其可能的利用價值。筆者發現，終明一朝，能始並非顯宦，也從未與萬曆以降的重大政治事件發生關係，在政壇上也無影響力。能始與牧齋在仕途及政壇上，並無任何直接交集。陳先生認為能始的利用價值在於其爲「福建士大夫之領袖」。能始此一身分可以確認，但此一「軟實力」如何介入或被利用於明季清初的政治場域，陳先生並沒有給出任何論據或例證。在無從驗證或反證的情況下，難以進一步展開討論。陳氏之說，終究只能視作一個富有啟發性的猜測，而非歷史事實，不宜盲從。

在陳先生「虛擬」的歷史世界中，第二個關鍵人物是江南總督洪承疇。筆者

因而細考順治四年洪承疇的具體經歷，以評估假如真如陳先生所說，牧齋是在該年被逮繫南京的，洪氏有無可能袒護他。考查結果顯示，洪承疇包庇牧齋，恐怕只是陳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無論是從順治四年江南的政治形勢，或是從洪承疇本人的經歷來看，這個可能性都不大。

本文探論的另一重心，在於牧齋是否認為能始之詩文無甚可取，其推崇曹能始實踰越分量。筆者發現，陳氏考述之材料頗有遺漏，其僅據牧齋《列朝詩集小傳》數語，即判定牧齋不甚欣賞能始之詩文。筆者考論的範圍擴展至牧齋作於崇禎十三年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至順治五、六年間之〈金陵社集諸詩人〉，以迄於順治十五年之〈稼菴近草序〉，並及若干關涉能始文事舊事之文章片段，此皆牧齋直接述及能始於其時詩壇地位之文獻。竊以為，從此等文獻可見，由明末而清初，時間橫跨近廿載，牧齋的論調、觀點、情感始終是一致的——牧齋相當欣賞能始，以其為文壇景仰之前輩人物，且引為同道知己。陳氏不考述此等文獻，其說失諸偏頗。

再者，陳寅恪先生沒察覺到，牧齋在〈曹南宮學佺〉小傳中稱能始詩「清麗」，在《列朝詩集》的總體批評觀中，已是肯定之辭，而更重要的是，陳先生沒發現，牧齋之評能始，不同時段有不同對待。牧齋譏議於能始，主要是針對其入蜀以後之作。筆者進一步發現，牧齋描畫能始著力之處，以及牧齋賦予能始最重要的意義，並非在中晚明詩派發展史或創作實踐中，而在萬曆以降更宏闊的人文環境、文化生產場域、文人交遊互動中。牧齋書寫能始所欲彰顯的，是一個時代、世代、人物的意義。要之，牧齋在〈金陵社集諸詩人〉中亟寫「金陵之極盛」，而能始於此語境中翩然現身。「金陵之極盛」是能始入蜀前的詩文、人文世界。在牧齋筆下，締造「金陵之極盛」的靈魂人物就是能始，牧齋給予能始的重視不言而喻。〈金陵社集諸詩人〉實乃考論牧齋之論能始至為重要的文獻，陳寅恪先生卻未引述此文，囿於一隅，有所偏蔽。

總言之，陳寅恪先生考論黃毓祺案，循「家族姻戚鄉里師弟及科舉之座主門生同年等」的「政治社會關係」脈絡設想，進而聯繫至牧齋於明季清初的政治企圖與活動，以及其時的歷史與政治情勢，實在發人深思。遺憾的是，陳先生的議論絕大部分不能成立，究其因，在於文獻考辨不周，執於一隅，失諸偏頗；又或根本未考論相關史實及人物的生平事蹟，即隨己意發揮，遽加判斷，導致詮釋錯誤與過度詮釋兼而有之。陳先生於《柳如是別傳》中對明清之際詩文作了大量政治託喻式解讀，每每引人入勝，心蕩神馳，但我們不能不加反思地全盤接受，盲

目跟從¹⁴⁷。今日距陳先生之著《柳如是別傳》，已隔四五十年，在陳先生奠下的基礎上，辨非求是，精益求精，是我輩的責任，也是學術更進一步的必要契機。

¹⁴⁷ 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頁8-20。

附錄：錢謙益文輯佚二首

筆者撰寫本文，特赴臺北國家圖書館借讀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曹學佺《石倉全集》之複印本。檢讀之餘，喜得錢謙益二佚文，俱不見載於錢仲聯先生所編《牧齋初學集》、《牧齋有學集》、《錢牧齋先生尺牘》（收入《牧齋雜著》）者。二文皆錢謙益致曹學佺函，雖寥寥小簡，字只數行，卻大可玩味，爰錄如下，以公諸同好焉。

一、錢謙益致曹學佺求為亡母作傳函

不肖謙益，孤窮狼戾，慈母背棄，奄及大祥，將謀窀穸之事。念生無以致一日之養，沒不能邀半通之綸，惟徼惠大君子之一言，發皇幽潛，信今而傳後，則庶幾得為子為人，他日可以見先慈于地下。用敢再拜發函，并託子石將之肅拜，以請于堂下，幸見憐而許之。

案：本文輯自〔明〕曹學佺撰：〈錢母顧太淑人傳〉，《石倉四稿·西峰六二文》（收入《石倉全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卷3，頁1a-3b）。學佺將此集命名為「六二」，收其六十二歲之作也，牧齋二文，作於明崇禎七年（1635）亦可推知。

謙益函前，學佺云：「膠川張子石來，予友海虞錢受之附以書曰……。」錄函後云：「余既獲交于受之，雖未識面，引古人神交之誼，千里猶同堂也，則又安得不引登堂之拜若母即吾母乎？」乃為錢母作傳，近千言。文內所及之子石，乃嘉定名士張鴻磐（1593-1678），牧齋詩文嘗屢及之，如《有學集》卷二三〈張子石六十壽序〉有云：「余取友于嘉定，先後輩流，約略有三。……侯氏二瞻、黃子蘊生、張子子石暨長蘆家僧筏、緇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於師友之間。」卷十九有〈張子石西樓詩草序〉，卷十一有〈吁嗟行走筆示張子石〉，可參。

二、錢謙益致曹學佺介紹張子石函

嘉定張生子石，其人清貞閒雅，居然不俗。詩句書法，種種清曠，是程孟陽、李長蘅一流人也。乘興遊閩中，過我曰：「此行為游武夷，噉荔枝，謁能始先生耳。」不肖羨之，力為勸駕，并附數行，先容于典謁。

案：本文輯自曹學佺撰：〈張子石南州草序〉，《石倉四稿·西峰六二文》（收入《石倉全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序上，頁15a-b）。

謙益函前，學佺云：「受之又有啓云……。」錄函後云：「時予正選嘉定四子詩。四子者，唐叔達、程孟陽、婁子柔、李長蘅也。覽子石詩，標新領異，貌境寫生，真足爲後來之秀，伍諸四君而無媿矣。受之每稱其人與詩，而俱曰清。清則絕俗，而曠與雅俱清者，詩之風也，詩未有風而不兼雅者也。清者，心之神也，神必無累而後能曠者也。子石之詩，可以風矣，其人亦脫然而無累矣。但云入閩有三事，曰噉荔支，其成熟時適在漳。漳南近廣，色香味之未必一一皆清也。若見不佞，則何異于楓落吳江之詭？歸途不得不遊武夷，是謂曲終而奏雅矣。并復諸受之。」

陳寅恪論錢謙益「推崇曹能始 踰越分量」考辨

嚴志雄

清朝建立不久，發生黃毓祺（1579-1648）謀反案。錢謙益（牧齋，1582-1664）受黃案牽累，逮訊南京。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對此案之考辨特為詳盡，逾六萬言。陳氏考論牧齋於黃案期間所作詩文，其中比較意外的是牽連及牧齋對已故詩人曹學佺（能始，1575-1646）的評價：「據此足見牧齋亦深知能始之詩文無甚可取。其請為母作傳，並序初學集者，不過利用之以供政治之活動耳。」又云：「綜觀牧齋平生論詩論文之著述，大別可分二類。第壹類為從文學觀點出發……。第貳類為從政治作用出發，如前論推崇曹能始踰越分量及選錄許有介詩，篇章繁多等。」

今欲檢討陳氏此牧齋「推崇曹能始踰越分量」之說，亟須考論二事：（一）能始對牧齋究竟有無政治利用價值？（二）牧齋是否欣賞能始之詩文？執此二端，本文上半，考述能始、牧齋在晚明政壇上的經歷，評估能始是否為牧齋可以利用之政治資本。本文下半，論文事。筆者將論證，陳氏用以論述牧齋談論能始之材料頗有闕遺，其僅據牧齋所為能始小傳中數語，即斷言牧齋不甚欣賞能始。本文考論的範圍擴展至牧齋作於崇禎十三年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順治五、六年間《列朝詩集小傳》之〈金陵社集諸詩人〉，以及若干關涉能始文事、舊事之文章片段，此皆牧齋直接述及能始於其時詩壇地位之文獻，陳氏不援據徵之，其說難謂允洽。復次，筆者將指出，牧齋書寫能始最獨特之處，非在中晚明詩派發展史的脈絡中，而在萬曆以降更宏闊的文化場域、文人交遊情況中，吾人對牧齋賦予能始的意義有重新認識的必要。本文將探論牧齋如何在萬曆盛世與金陵詩社之「極盛」的特殊語境中描畫能始。

關鍵詞：陳寅恪 錢謙益 曹學佺 黃毓祺 詩歌 政治

On Historian Chen Yinke's Argument that Qian Qianyi's Literary Criticism on Cao Xuequan Was Motivated b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Lawrence C. H. YIM

The acclaimed modern historian Chen Yinke argues that Qian Qianyi's (1582-1664) literary criticism on poetry and prose writings consists of two types: One can be considered as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Another is, however, infused with political purpose, such as the unjustifiable commendation of the late-Ming poet Cao Xuequan (1573-1646). Chen holds that Qian's praise of Cao was motivated by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e., to help bring about his release from custody in Nanjing from 1647 to 1649 because of his suspected involvement in an anti-Qing uprising led by Huang Yuqi (1579-1648).

This paper unfolds in two parts. First, it conduct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fficial career of the chief personages concerned, to critically assess the assumed plausibility of a political bonding among them. When Qian was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Cao had already died two years earlier. What was the political use of a dead poet for Qian's legal defense in the lawsuit? Being intrigued by Chen's theory, I examine and illustrate the true nature of Qian and Cao's friendship and their writings on each other.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tries to reconstitute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Qian lauded Cao's achievements. I argue that Chen's assertions are problematic, and that Qian had, throughout his long life, admired Cao as a wonderful poet from the Wanli (r. 1572-1620) era. Furthermore, scholars in the past have paid attention only to the role that Cao play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alled Min (Fujian) School of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I nevertheless maintain that Qian's admiration of Cao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light of Cao's contribution to Nanjing's extraordinary blossoming of literary clubs and societies in the Wanli era.

Keywords: Chen Yinke Qian Qianyi Cao Xuequan Huang Yuqi poetics
politics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徵引書目

- 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年。
- 王士禛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王夫之評選，李金善點校：《明詩評選》，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
- 王宏志：《洪承疇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 輯錄：《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何冠彪：〈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明、清之際士人對萬曆朝的眷戀〉，《九州學林》第3卷第3期，2005年秋季，頁85-115。
- 何齡修：〈《柳如是別傳》讀後〉，《五庫齋清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 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李欣錫：《錢謙益明亡以後詩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
- 李貴生：〈文學鑑賞與歷史詮釋：陳寅恪批評觀念探析〉，《國文學報》第62期，2017年12月，頁237-282。
- ：〈陳寅恪典故考釋批評觀念及其實踐方法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9年6月，頁341-388。
- 李新達：《洪承疇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 洪承疇：〈江南總督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揭帖〉，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年。
- ：《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收入孔昭明編：《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4輯，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
- 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孫文秀：《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
- 徐燊著，陳慶元、陳煒編：《龍峰集》，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
- 徐燊著，陳慶元編：《徐燊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曹孟喜：〈明殉節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雁澤先府君行述〉，見曹學佺：《曹學佺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曹學佺：《石倉全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 _____：《曹學佺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
- 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
- 郭黛暎：《竟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 _____：《蔡復一的詩文人生》，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1年。
- 陳邦彥編：《御定歷代題畫詩類》，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5-14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陳廣宏：《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陳慶元：〈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曹學佺《石倉全集》初探〉，收入程章燦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 _____：〈徐燏年表〉，《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頁57-66。
- _____：〈曹學佺年表〉，《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頁75-81。
- _____：《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 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程嘉燧撰，上海市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編，沈習康點校：《程嘉燧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溫睿臨：《南疆逸史》，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
- 鄭禮炬：《明代福建文學結聚與文化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_____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_____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嚴志雄：〈導論：忠義、流放、詩歌——函可禪師新探〉，見嚴志雄、楊權點校：《千山詩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年。
- _____：《牧齋初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
- _____：《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
-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Wang, Chen-main. *The Life and Career of Hung Ch'eng-ch'ou (1593-1665): Public Service in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 Ann Arbor, Michigan: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1999.

